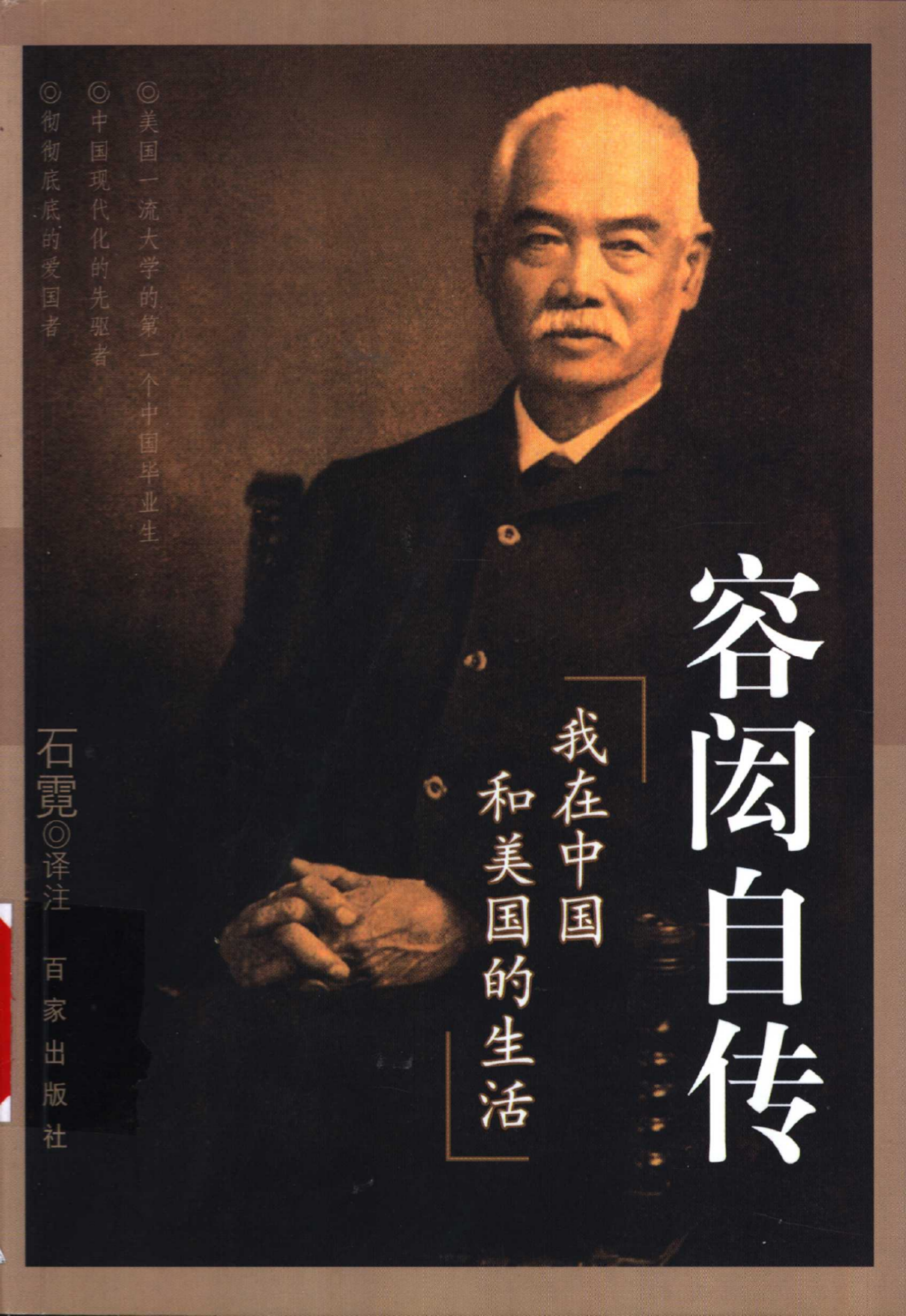


A sepia-toned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He is seated, with his hands clasped in his lap.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 容闳自传

我在中國  
和美國的生活

◎ 美國一流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畢業生

◎ 中國現代化的先驅者

◎ 徹徹底底的愛國者

石霓◎譯注 百家出版社

Yung Wing

## 我在中国 和美国的生活

在艰辛的人生中，一个人必须是一个梦想家，这样才能完成可能成功的事。我们来到人世间，不能只是为了动物般的生存而单调乏味地劳碌着。我为了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我以为我应当尽力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有限知识，与其我个人受益，不如成为我的民族所其有的福祉。我不断更换和改变职业，只是为了弄清楚我的忍受力。以及我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中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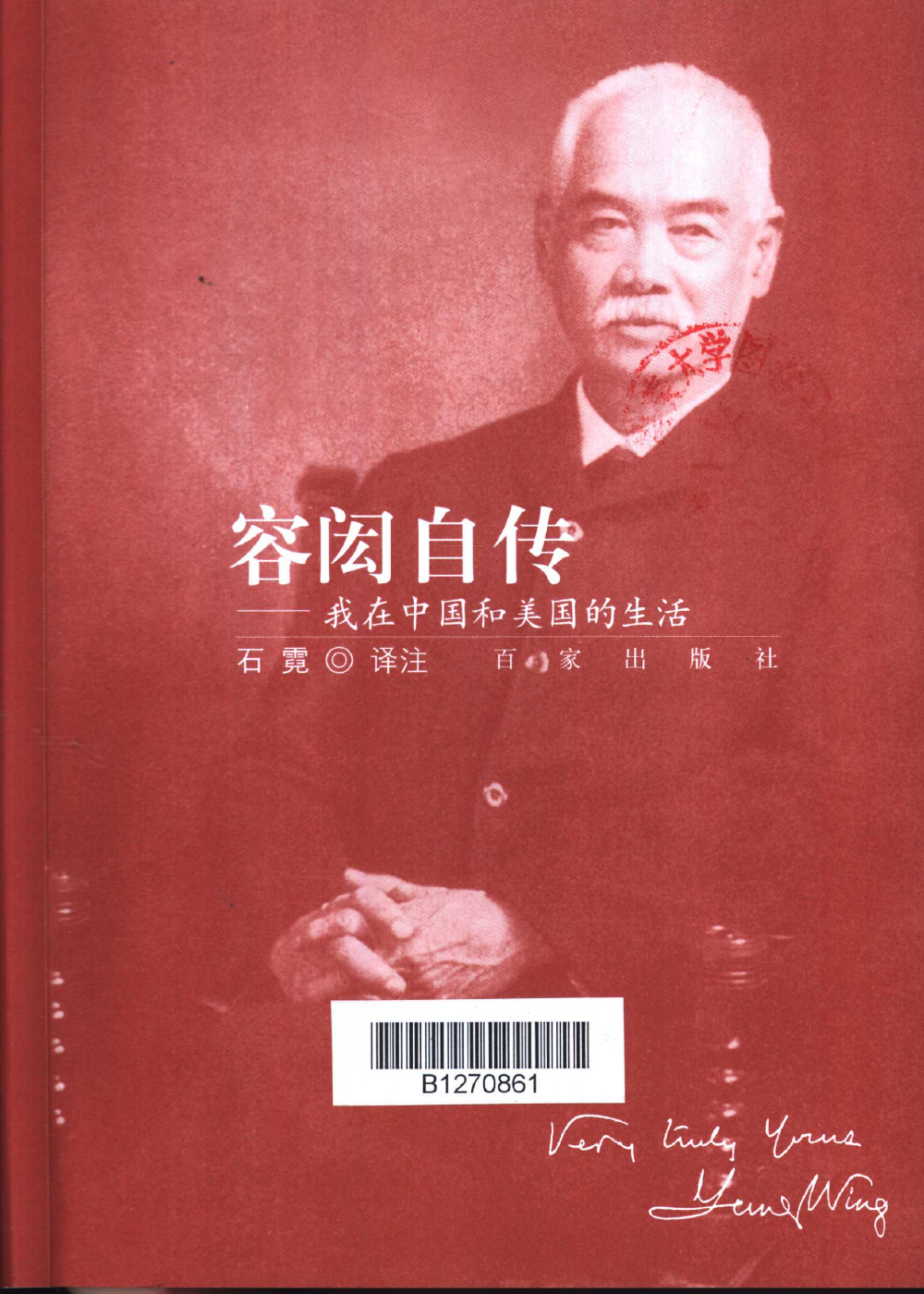
—— 容 闳

ISBN 7-80656-851-4



9 787806 568514 >

定价：19.80元

A sepia-toned portrait of Rong Yin, an elderly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high-collared jacket. He is seated with his hands clasped in front of him.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 容閔自传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石霓 © 译注

百家出版社



B1270861

Very truly yours  
Yung W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 石霓译注.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8  
ISBN 7 - 80656 - 851 - 4

I. 容... II. ①容... ②石... III. 容闳  
(1828~1912)—自传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204号

|       |                                |
|-------|--------------------------------|
| 书 名   | 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
| 译 注 者 | 石 霓                            |
| 责任编辑  | 丁翔华                            |
| 特约编辑  | 季永桂                            |
| 封面设计  | 梁业礼                            |
| 出版发行  |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12.875 插页 6                    |
| 字 数   | 284 000                        |
| 版 次   | 2003年8月第1版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
|       | ISBN 7 - 80656 - 851 - 4/K · 9 |
| 定 价   | 19.80元                         |



容闳故居遗址（南屏镇西大街三巷1号）



1865年，清廷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此人重用容闳，派他到美国为上海江南制造局采购机器。下图为容闳书写的采购支销单（选自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To Cash paid Expenses for self \$ 3346.20  
for 1864-5  
Hastings travelling Expense. 2845.18  
1/2 month's Salary 5000.00  
add \$1500 Passages for paper to \$ 11191.38  
Shanghai 1500  
Remitted Payment  
Shanghai 20<sup>th</sup> September 1865  
Young 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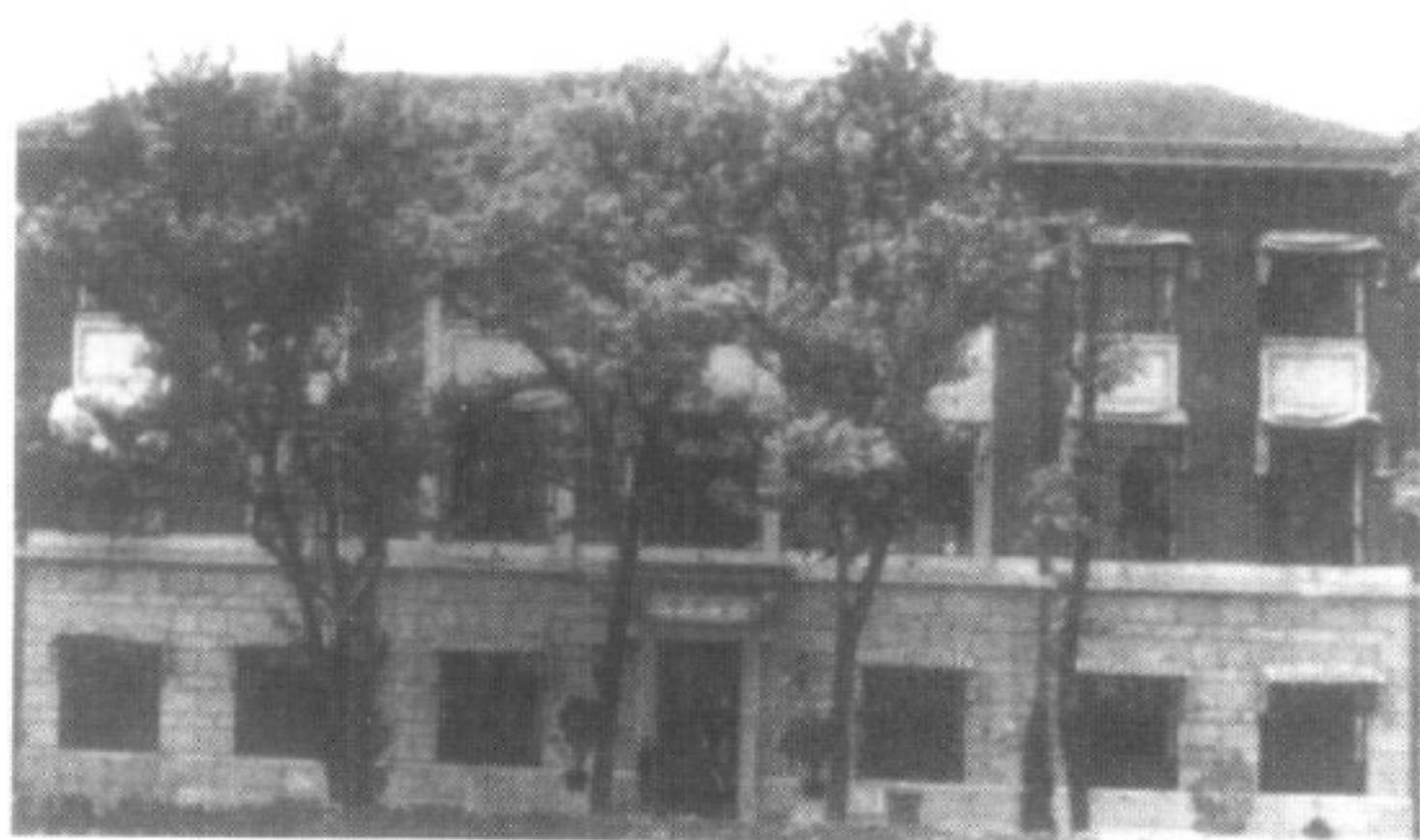
主持留美教育时的容闳



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詹天佑（左）与梁敦彦（右）



1872 年第一批赴美国留学幼童出发前在上海的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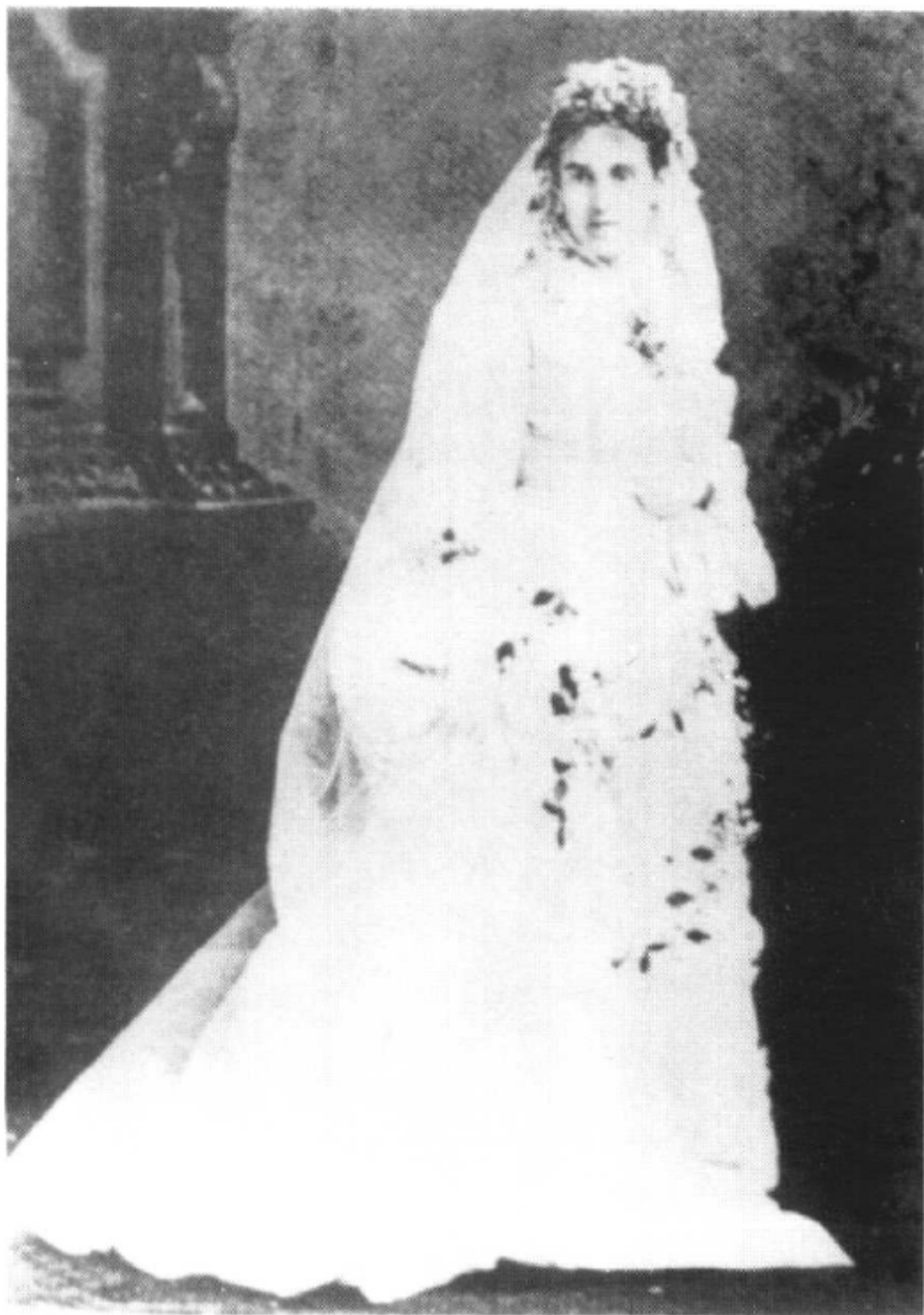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于 1933 年兴建的容閔纪念堂

MA 383.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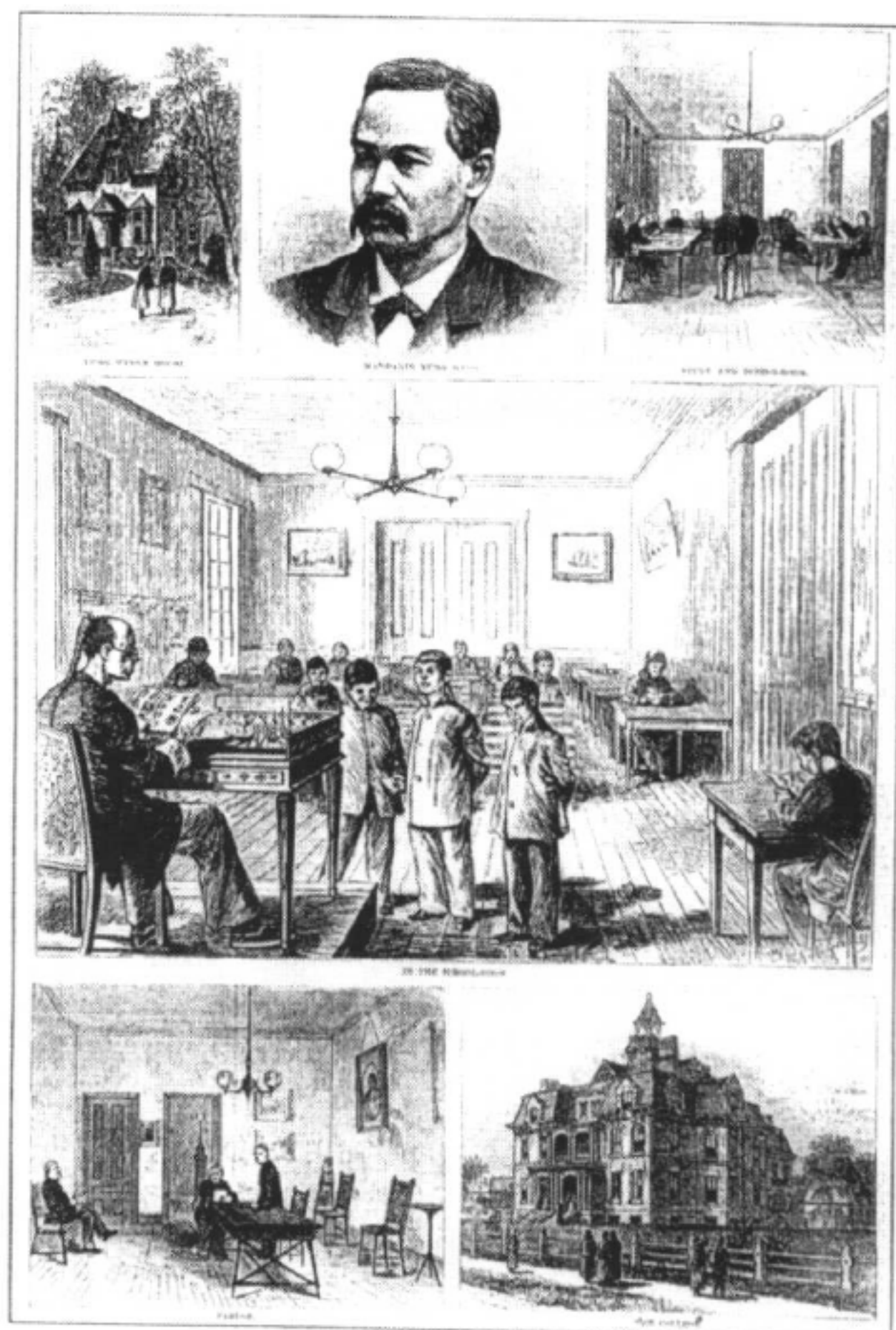
容闳于 1871 年倡办的南屏甄贤学校



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路易莎·凯洛格 (Mary Louise Kellogg)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  
 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  
 以閒為自在。將壽補蹉跎。  
 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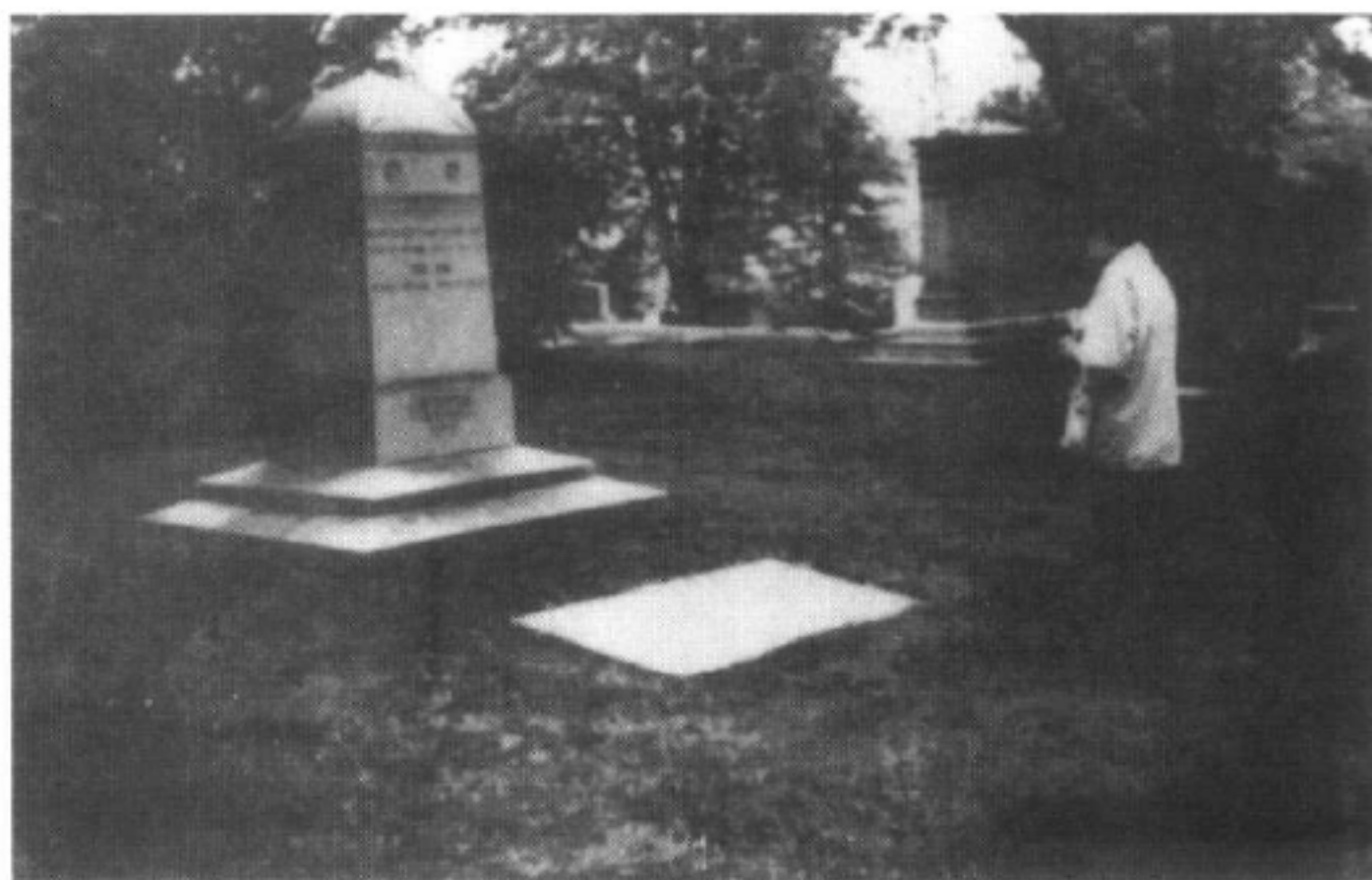
容閔于1887年新年写下此诗，以表达他当时痛苦和孤寂的心境。



容閔在美国康州为中国学童设办的学堂



晚年的容闳在美国寓所



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市容闳的墓地



## 前 言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署名 Yung Wing。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生于 1828 年 11 月 17 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卒于 1912 年(民国元年)4 月 21 日。他于 1909 年完成的英文自传性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全书共二十二章,并有“自序”一篇。还附有其美国友人杜吉尔牧师 1878 年 4 月 10 日的演说一篇。他从自己出生那年(1828 年)写起,一直叙述到 1902 年止。自述其童年在澳门接受启蒙教育,至澳门、香港两地的少年学习生活,再至美国留学八年。接着叙述他 1854 年学成回国后为实现心中的理想——使祖国文明富强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追求历程以及为此所从事的教育、外交、经济、政治等活动。自述其经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军、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以及投身于洋务事业、维新运动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1909 年 11 月,该英文著作由美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曾由徐凤石、恽铁樵用“新民体”节译为中文,书名为《西学东渐记》,1915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按此译本校点重印,并补译容闳的“自序”和杜吉尔牧师的演说,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中译本尚有中华书局于 1991 年出版的王蓁译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此外,1969 年日本出版了日译本容闳自传(百濑弘译注、



坂野正高解说)。至于本译注的出版,完全是因撰著《容闳评传》而作。在撰写《容闳评传》中,深感资料不足,更深感对容闳思想把握不够,强烈的想法就是亲自细读容闳英文自传,因为它毕竟是容闳生前最主要的著述(尚有其他零星手稿散见于各处),这是更好地把握容闳思想、观念和人格的关键。又幸得美国高宗鲁先生赠送我一本容闳英文自传——一件最珍贵最美好的圣诞礼物。于是我进入了容闳的自述中,用我的心去与他交谈,用我的心去理解他的语言,用我的心灵去感受他的心灵。就这样,边译边注,便完成了本书。

我将容闳英文自述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我从始至终都在感动着。与其说容闳是在追忆他所逝去的大半生的生活岁月,不如说他是在淋漓尽致地剖白自己的心灵,他的语言朴实真挚,谈及家庭甚少,通篇流淌着他对祖国的热爱、眷恋和向往,袒露的是他那一颗炽热坚贞的赤子之心。正如他1901年抵台湾,面对时任“台湾总督”的日本将领儿玉源太郎时毫无畏惧地表白的那样:“我完全处在你的控制之下,只要你希望这样的话,可以随时将我送交给我的敌人,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正是因为宁死不屈地热爱着祖国,他才对祖国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他才为祖国的富强和他的人民的安康幸福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因此我感到,无别的语言,惟有用“赤子”来涵盖容闳才最为妥当,容闳是赤子,是赤子容闳。

容闳在出国留学前已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以上,他与家庭及故土的情结业已形成,祖国的概念已经清晰,这是 he 之所以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最终铸就他一颗赤子之心的,正是后来的继续教育,他说“因为教育的的确



确已扩展了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进而启示我应负的种种责任”。不过,爱国无需要理由,如同爱自己的母亲一样,不需要理由,不爱自己的母亲才需要理由。一个中国人热爱中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容闳热爱中国的方式跟传统中国人的不一样,后者的方式几乎都是百变不离其宗,就是维持中国陈陈相因的肌体,绝不可触动。容闳则是要触动中国的肌体,使已衰老腐朽的老大帝国焕发青春,获得新的生命力,变成文明强盛的国家,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不再任凭西方列强的欺辱宰割。他采用的方法,就是用西方先进文明作为新鲜血液持续性地注入中华老大帝国的肌体,使之完全获得活力。其具体办法就是让中国年轻一代像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从而“将西方教育移植应用于东方文化”,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进而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他在大学期间形成的教育计划,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对此,他叙述说:

“整个大学期间,中国的可悲状况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令人痛惜的一幕幕,使我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年,我的心情则更感压抑。每当我消沉失望时,我就常常希望自己要是从未接受过教育多好,因为教育的的确确已扩展了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进而启示我应负的种种责任,而这些责任决不是那些愚昧无知、闭目塞聪的人能够感受得到的,而人类的苦难和邪恶,也决不是那些没有教养、冷漠无情的人能够敏锐感知的。一个人懂得的知识愈多,他的痛苦就愈多,必然地,他的快乐也就愈少;反之,一个人懂得的知识愈少,他的痛苦就愈少,因而他的快乐也就愈多。可是,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下的,其感情是怯懦的,决不属于品德高尚的人,实不足以称道。为了获得



教育,我远涉重洋,凭借勤奋刻苦和自我克制,我终于在竞争中达到了渴望已久的最值得追求的目标。虽然我所学到的知识没有理想的那么完满均衡,还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我完全合乎大学普通教育的标准,完成了大学文科教育的计划。因此,我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已受教育的人,而且就以此种身份,我应该问自己:‘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于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我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1854年到1872年这长长的岁月里,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为圆满完成这一目标,我一直在苦苦地努力着,默默地期待着。”(第五章)

为了实现心中的目标,他放弃留在美国谋求优越地位的机会,于1854年一毕业即返回中国,历经18年,直至1872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但这一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究其根源,是老大帝国的守旧势力太强。

容闳不仅与传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截然不同,而且与其他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也存在根本不同之处。他从童稚之年直至青年的求学经历,使他具有逸出群体而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毫无封建专制根基的美国多年的文化熏陶并接受系统的西方文明教育,更使他成为一个异数。不同的文化背景,



塑造不同的世界观,他早已具有民主、自由和共和国的思想观念。他的这一思想观念最迟是在大学时期形成的。例如他 1854 年大学毕业时,其同级学友给他的临别赠言是:“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愿你回归天朝之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我深深相信亲爱的闵,你为促进那里伟大的自由之树生长,将起重要的作用。”<sup>①</sup>另一位同级学友赠言是:“我有理由常常想起你,因为你有善良的心灵与善良的感情。我希望你为自己展布的生命之线不要过于炽热。当我冥思我的级友的好运时,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将因为知道你,我的亲爱的闵,曾经分担这份光荣的工作,而更为增强。愿上帝保佑你,愿成功与你相随。”<sup>②</sup>显然,这些赠言是针对容闵的思想和抱负的。毫无疑问,容闵那时的思想观念是与其美国同学们一致的,并且他已树立起相应的奋斗目标。不仅如此,他在大学期间还时常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显示出“具有治国之才的特性”。又如当太平军势力到达长江流域并定都南京时,容闵于 1853 年 7 月 27 日写信给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请立即告诉我这次革命的情况,我对它所有的活动都极感兴趣。”<sup>③</sup>足见容闵对中国国内时局的极其关注,他意在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也正

①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闵文献述评》,载于吴文莱主编《容闵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6 页。

②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闵文献述评》,见《容闵与中国近代化》,第 576 页。

③ 1853 年 7 月 27 日容闵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袁鸿林《容闵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是这一思想,驱动着他为革新中国、为追求祖国文明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了一生。

但人们评价容闳,说他可贵在于“与时俱进”,似乎是说容闳能跟上时代潮流,或是说他的思想能紧随国内那些先进思想家的感召。显然这不尽符合容闳的思想发展轨迹。事实上完全可以说,容闳的思想比同时代的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要先进和超前得多,也就是说他在1854年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平等、自由、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成熟。即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也无法与容闳相比。只有孙中山,容闳与他的思想才真正发生共鸣,俩人终成为推翻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志同道合者。如果说容闳“与时俱进”,那只能是指他从未泯灭热爱中国之心,从未停止拯救中国的努力;如果说容闳“与时俱进”,那也只是手段上或策略上的与时俱进。容闳始终在寻求新的更为先进的政治力量作为依靠,以帮助他逐渐接近自己的终极目标。他最初依靠的是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势力。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势力兴起,他随即投身进去,无所畏惧地,全身心地;后来他愤然与康有为等改良保皇势力决裂,而投身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总之,他始终在寻找拯救中国的力量和希望,也始终满怀希望地在寻找先进的力量以拯救中国。虽然失望太多,但愈挫愈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容闳回忆录终止于1902年,并且1902年的活动也未详述,而他完成自述写作则是1909年11月,为何不叙述至1909年?为何要留下一段空白?这是令人揣摩的。有资料表明,容闳早在1901年之前就开始写回忆录了。如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记录年轻时的他在1901年避难于香港时拜见容闳的一



段情景,当时容闳“手持西装书一本”,对刘禹生说:“此我写在中国十年事也(书面标‘Ten Years In China’),汝细读之,书中所载,足备征引。”<sup>①</sup>可以断定,容闳那时所写的中国十年事,应该构成他后来出版自述中的一部分内容。不久,即1902年5月他离开香港前往美国,以后在美国大概断断续续地在著述。因为他成书时段,从书中字里行间来看,明显是1908年至1909年,尤其是集中于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至1909年11月这一年撰写而成的。揣摩他在回忆录中留下最后一段人生空白的原由,不妨先分析他书中的一段话,他说:

1845年当我还在马礼逊学校读书时,我曾写过一篇作文《溯哈得孙河遨游纽约之幻想》,但那时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以后会真的置身于纽约城中。这件事不禁引起了我的沉思:我们的幻想有时预示着深藏于我们头脑里的意愿,并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中国留学生教育计划是我毕业前一年产生的幻想,是幻想变成现实的另一个例子。而我娶了一个美国妻子,则也是幻想得以实现的又一佐证。我仍有许多幻想等待着实现,它们是否能成为现实,我想还是等待未来去决定罢。(第三章)

其实,容闳留下的,并非是无所内涵的空白,而是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事实上,他从1902年回美国直至1912年去世前夕的整整十年,他仍在继续致力于拯救中国的革命活动。他之所以抛开这些内容不写,是在等待他的另一个幻想的实现,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推翻专制统治,使中国人民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由于1909年时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

<sup>①</sup>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0页。



尚处于秘密状态,革命尚未成功,不可泄露于世,这大概也是他对那些活动只字不提的重要原因。

1898年戊戌变法后,容闳遭清廷通缉,逃离北京,避居于上海租界。此时他对清王朝彻底失望。同时对他这个遭通缉的人来说,他的一切为国效力的实业活动也不得不停止。于是他有了反省过去和思考未来的时间。在回忆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报国无门的痛苦遭际的同时,他终于放弃温和渐次革新中国的救国方式,决意以武装形式彻底推翻极端专制保守又腐朽愚昧的清朝统治。因此他随即投身于筹划武装起义的活动。1900年春,他从上海到香港,与兴中会会长杨衢云、会员谢缙泰秘密会谈,赞成联合各派力量拯救中国,并主张应尽快与各派力量联合与合作。谢缙泰认为容闳是“真正的爱国者”,并向杨衢云“强烈建议”,“推选容闳博士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sup>①</sup>当年初夏,唐才常等人欲利用义和团在北方掀起反帝高潮的时机,在长江沿线发动自立军起事,与孙中山策动的惠州起义南北呼应。起事前,拟将“自立会”改为“中国国会”,以用国会名义,公开号召国人奋起自谋以救中国。容闳参加了这次起事的核心筹划工作。7月,国会在上海召开,容闳被公举为会长,“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上意气风发,鼓掌雷动”。<sup>②</sup>容闳在自传中说自己组织了国会,与会者章炳麟也说:“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sup>③</sup>容闳还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八条,提出立20世纪

① 谢缙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1921年)。

② 孙宝鎔:《日益斋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10页。

③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予人民以立宪自由的政治权利,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废除清政府的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反映了自立会的“自立”的政治主张,为自立军起事进行舆论准备。不久,自立军事败,张之洞将唐才常等20余人捕杀。容闳再次成为清廷指名通缉的政治要犯,国会也遂告云散。容闳则逃离上海。1900年9月1日,他化装变名“秦西”,与孙中山一道在上海搭乘轮船“神户丸”前往日本。在日本作短暂逗留后乘船赴香港。此时孙中山对容闳已十分敬仰,他也认为可推容闳为领袖,联合各派力量反清。1900年8月22日,他在离开横滨前往上海之前就说:“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sup>①</sup>

容闳在1900年9月至1902年5月,大部分时间都居于香港。其间,参与兴中会活动。1901年,谢纘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计划联络会党在广州起义,李纪堂得遗产百万元,便慨然独自承担发动起义的全部经费,遂在香港成立总机关,拟于1903年1月28日起事。他们拟成功后建立临时政府,以容闳为总统。容闳对此计划虽表示赞成,但他认为必须先争取国际的声援,尤其是争取美国的支持。这就是他1902年返回美国的原因所在。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怀着一颗救助中国之心回到中国起,直至1902年,他在中国一呆就是八年,两个留在美国

<sup>①</sup>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8页。



读书的儿子也八年不与他谋面,他似乎已抛弃家庭的杂念,惟有中国不曾忘怀。

容闳于1902年5月16日离港,6月12日抵旧金山。到达旧金山后即访阿巴基上校(Col. Wm. C. Albarger),长谈一小时半,均有关中国近事及其前途。9月19日他收到谢缙泰写于8月13日的信,要求他“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与支持”。9月21日容闳复函说:“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能力来满足您世界彼端的要求。尽快把暗号或密码转送给我,这是我们通讯必不可少的附属品。”<sup>①</sup>12月19日容闳收到了谢的信和密码,12月22日他复信谢。<sup>②</sup>但广州起义因事机不密,未举而败,加上容闳是清廷通缉要犯,这才使他不得不留居美国。他虽身在美国,但心始终系于中国。1903年夏他致书好友杜吉尔,谈到在海滨消暑趣味远胜于往日在上海、香港度夏生活,但仍不能完全放开对中国之注视与关怀,每日惟有撰写些许有关中国计划以自娱。此后的十年里他一直与中外相关人士保持联系和接触,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时局。如1903年4月,梁启超游历美国,特往哈特福德城谒容闳。“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sup>③</sup>1905年康有为访美时也专程去拜望容闳,容闳还两次亲自陪同康有为去会见美国总统T·罗斯福。

① 谢缙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② 容闳:《1902年日记》,英文未刊手稿,藏美国哈佛康涅狄格州图书馆,转引自袁鸿林《容闳述论》。

③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9页。



但时至1908年,容闳终于与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决裂,并向华侨和美国友人以及国内同志揭露康有为的卑劣行径。他称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靠之维新人物”,对康有为将华侨捐得款项作为私用极为愤慨,认为这是“自己伤害嘲弄自己”。<sup>①</sup>同时他说服美国军事学家荷马·李(Homer Lea)和银行家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由赞助康有为、梁启超维新保皇转向支持孙中山革命。容闳认为孙文是一很重实际的人物,为广东之干城,如加以支援,其计划当可实现。于是他提出一项“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意在美国募集巨款以支援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容闳写信敦促荷马·李乘机立即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孙中山应容闳之邀赴美国,商讨武装起义计划。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一举颠覆清朝专制统治。喜讯传来,83岁高龄的容闳激动万分,但他在看到胜利的曙光的同时,也洞见到新的危机,他以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政治阅历,写信给国内友人,谆谆告诫革命党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相信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必须把他与清朝统治者一齐撵走。并殷切期望革命党领袖们能倾听民众“成立一个共和国”的呼声,为中华民族“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特致函容闳,说容闳“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域”,并说“当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逃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鼓舞”。又说“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

<sup>①</sup>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



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先生所赐矣。”<sup>①</sup>可是,容闳于1911年5月患中风,从此即感身体不适,孙中山函达到一星期前,他得脑溢血已昏迷不醒。容闳临终前,谆嘱身边的两个儿子务必回到中国,承接他的心愿为祖国建设服务。“公易箠前,犹嘱其二子觐彤、觐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二子良不愿,缘当时均有优异之职业,月俸甚厚。公责之曰:‘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之务,惟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于汝二人者。’二子逼于正义乃从父命,遄归祖国。”<sup>②</sup>

容闳带着对刚诞生的共和国的安危的担忧走了。事实证明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邃的政治洞察力,但他的真知灼见没有被革命党领袖们所珍视,袁世凯很快就轻而易举地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垂成之功竟毁于一旦,中国社会更加黑暗。然而容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先驱,他对祖国母亲已完全尽到了他的赤子之心,他已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正如美国友人杜吉尔先生说的,他所做的一切,“则饱含着他对祖国最真挚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从头到脚、他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他信赖它,确信它有远大辉煌的前程,配得上它那高贵壮丽的山河和它那伟大悠久的历史”。

容闳饱经沧桑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的自传就是一部爱国史。至于他有些主张正确与否或是否具有可行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页。

② 1929年重修南屏《容氏谱牒》卷十五。



性,应另当别论,而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爱国,这是他最可贵之处。他在书中除了表白自己的一颗爱国心外别无丝毫夸耀。相反,他的自述却过于简略,他实际上为中国做的事情远比他书中叙述的要丰富得多,诸如很多实业活动均只字未提。他留学美国多年,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精英,且文学素养高,但他运用外语的熟练程度超过他的母语,正因为如此,他不善于用中文写作和著述,也因为如此,他的思想、理论和主张很少为国人所了解,或者干脆变成别人著作中的东西,他绝少有中文的作品公诸于世而流传开来。正因为这一不足,大大降低了他在祖国同胞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他在维新活动中的实际作用远不止他自己说的“我的寓所成为戊戌年主要改革者的约会场所”。有资料表明,维新变法主张中含有他的许多思想。可以说,容闳是一位极有学识的人,但他又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一位活动家,一个行动者,他平生事业重在实践;他是一个极富于幻想的人,但他又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的计划和主张都是注重实际的产物;他是一个执著追求理想的人,认准了的理想,他则不屈不挠地追求下去,为了救助中国的理想,他追求了一生,至死不渝;他毕生致力于西学东渐,但毕生也致力于东(中)学西渐。此外,容闳自传中无不流露出他是一位极注重品德修养和维护国格人格尊严的人。而且崇尚科学及教育是他最基本的人格要素。他信仰基督教,但他绝不迷信。例如他对洪秀全说自己飞升天国见到上帝的阐释,认为那全然是精神性的幻觉,是神志昏迷状态下出现的错觉。上帝只在人们的心中,信仰只是一种道德的东西,它能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不做坏事,只做善事,使个人道德趋于完美。因而他在自述中多处赞美那些具有基督品格的人。因此可以说,容闳的宗教



信仰,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具有唯物世界观的人,而他的爱国强国之梦,则正是建立在对科学和教育的执著追求基础上的。

容闳自传原文多处有错漏,主要是在具体时间上。纵观全文,显然其原文初稿并未经仔细检查或校对。例如叙述同一个日期,在前文是错,但下文又是正确的了,包括他父母亲去世的时间均有误。容闳在自传首页标明此回忆录是以深情的爱献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他在行将走完人生之旅的最后阶段,用回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留给他的两个儿子,其目的无疑是要让他们继承他热爱中国之心。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连亲人们的去世日期都弄错。细想容闳在八十高龄写回忆录,哪能无一丝差错,况且又未加审核。不过,具体时间或小情节可能略有出入,但他叙述的事情却是真实的,尤其是大事情上,非常清晰准确。所以只要细心追究,就不会曲解容闳自传原文,就不会产生疑义。

我在翻译时做到全译,本着忠实于容闳原文的宗旨,包括原有的格式,除对极少数符号和格式的调整外。无论翻译标准如何,我惟一的心愿就是能奉献一本较完整较确切较通俗的容闳自述的中译本。

同时对容闳自传注释较为详尽,真诚用意是想给读者朋友带来一些方便,尤其是史学界外的朋友,藉此能全面了解容闳自述,了解他书中提及的人物和事件,进而整体了解那段历史和那个时代。

重点注释的有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虽说是注释,但已有评注的倾向。第十六章中,天津教案给容闳实现留学教育计划造成一个绝好契机。而天津教案之所以能成为容闳实现梦想的良辰,是因为教案对曾国藩等会办大臣本身触动太大,尤其是曾国藩这一首要办案人,因办此案,他大失民心,为此他自己也负疚于心,极感痛苦。正是有了这样深刻剧烈



的刺激,他才深感选派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第十七章是中国出洋肄业局的建立,是本书的重点,对留学章程等作了详细陈述。第十八章反映的是容闳的外交工作。第十九章是肄业局的终结,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对其终结原因作了详细分析,因而该章的附注内容,所占比例较大。读之,可了解容闳在传统中国所处的尴尬地位和清政府中途裁撤驻美肄业局并召回全体留学生的根本原因,以及理解李鸿章对此事的真实心境等等一系列问题。

另外,附录部分有容闳申办银行和铁路条陈,是不可多见的容闳的中文作品;再就是两篇留美幼童回忆译文,可作为容闳自述的补充内容。

本译注的主旨,不在于只补正以前的译本的错漏,而是想更确切把握容闳的现代化的思想和现代化的人格。愿通过本译注,能使世人了解一个更真实的容闳,了解他极光彩夺目极具有价值的一生。

面对译稿,心灵的感动和净化的同时,仍有一种莫名的哀愁,一声哀叹依然从心底里迸出。然而,还容闳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的时代毕竟来到了。当今的“科教兴国”,正是当年容闳九死不悔地毕生所祈望和追求的。赤子容闳感到哀伤的那个悲哀的时代已逝去,他的祖国正变得文明富强,他对祖国的永恒热爱和他那晶莹高洁的品格,必将永远受到后人钦仰,也必将教育后人将祖国建设得更加文明富强。

石 霓



## 自序

本书前五章叙述了我赴美国之前所受的早期教育,以及到美国后的继续学习,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城的孟松学校读书,后进耶鲁大学深造。

第六章从我出国八年后又回到中国社会开始。一向作为西方文明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的心灵世界发生彻底的变化,当他面对一个那么完全不同的人时,使他感觉和表现好像 he 自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奇怪了吗?我的情况的确如此。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减弱。正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变得更加强烈。因此,接下来的几章将看到我全身心地倾注于我的教育计划的设计及实施,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达,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适宜的办法。随着中国出洋肄业局的突然撤销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锋队的 120 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由此终止。

从 1872 年开始相继出国的那些留学生的尚存者,有几人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工作,终能跻身于中国主要的治国之才的前列,并且正是由于他们,原先的中国出洋肄业局才得以恢复,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因此,如今人们可以看到中



国学生正在大量地甚至从遥远的地方(the distant shores of Sinim)<sup>①</sup>来到欧美接受科学教育。

1909 年 11 月于康涅狄格州  
哈特福德城阿特伍德街 16 号

---

<sup>①</sup> Sinim: 这个词的拼音,可能是指中国青海省的西宁。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1   |
| 自 序 .....              | 1   |
| 第 一 章 童年时代 .....       | 1   |
| 第 二 章 少年学生生活 .....     | 12  |
| 第 三 章 前往美国及最初经历 .....  | 23  |
| 第 四 章 在孟松学校 .....      | 29  |
| 第 五 章 我的大学生活 .....     | 40  |
| 第 六 章 返回中国 .....       | 46  |
| 第 七 章 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  | 60  |
| 第 八 章 从商经验的获得 .....    | 68  |
| 第 九 章 首次到产茶区旅行 .....   | 81  |
| 第 十 章 访察太平军 .....      | 93  |
| 第十一章 对太平军起义的看法 .....   | 108 |
| 第十二章 太平县产茶区的探险 .....   | 119 |
| 第十三章 会见曾国藩 .....       | 127 |
| 第十四章 履行赴美购置机器的使命 ..... | 142 |
| 第十五章 第二次归国 .....       | 148 |
| 第十六章 我的教育计划的提出 .....   | 157 |



|       |                                                                  |     |
|-------|------------------------------------------------------------------|-----|
| 第十七章  | 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 .....                                                  | 177 |
| 第十八章  | 赴秘鲁调查非法华工贸易 .....                                                | 202 |
| 第十九章  | 出洋肄业局的终结 .....                                                   | 215 |
| 第二十章  | 北京之行和妻子逝世 .....                                                  | 277 |
| 第二十一章 | 被召返国 .....                                                       | 284 |
| 第二十二章 | 戊戌政变 .....                                                       | 307 |
| 原著附录  | 杜吉尔牧师(Rev. J. H. Twichell)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肯特俱乐部发表的演说<br>..... | 319 |

## 附 录

|     |                                                                                                                 |     |
|-----|-----------------------------------------------------------------------------------------------------------------|-----|
| 附录一 | 容观察阅请创办银行章程 .....                                                                                               | 337 |
| 附录二 | 容观察阅铁路条陈和津镇铁路条陈 .....                                                                                           | 346 |
| 附录三 | 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追忆<br>——容揆·麻州春田耶鲁大学84届毕业生致<br>Mary E. L. Burnham .....                                                | 353 |
| 附录四 |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br>——容尚谦(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br>And Its Influence—By Yung Shang Him)<br>(1939年于上海)..... | 374 |
| 附录五 | 生平大事年表 .....                                                                                                    | 386 |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1828年11月17日,我出生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之西南的南屏乡,<sup>①</sup>距澳门约4英里,该乡位于澳门以西的佩德罗岛(Pedro Island),<sup>②</sup>岛与澳门之间相隔半英里宽的海峡。

我的家庭中有四个孩子,哥哥最大,姐姐第二,我排行第三,第四是一个弟弟,他最小。如今我是四个人中惟一还活着的。

早在1834年,一位英国妇女,她就是到中国来传教的查尔斯·郭士立牧师<sup>③</sup>(Rev. Charles Gutzlaff)的妻子——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sup>④</sup>在伦敦妇女协会的赞助下,以推动印度和东方女子教育为目的,她来到澳门,很快就创办了一所女孩子学校,招收中国女孩子入学,以从事她的传教事业。不久又开办了一所男孩子学校。

当时给郭士立夫人作买办或家务总管(comprador or factotum)的那个人,恰巧是我的同乡,实际上又是我父亲的邻居和朋友。我父母正是从他那里了解到郭士立夫人开办学校的情况的。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的劝导和帮助,我父亲才送我进了那所学校。比我大好多的哥哥照例进了正统的儒家

① 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南屏位于澳门西北;1英里(哩)=1.609公里。

② Pedro: 佩德罗牌戏(以王牌5点为胜牌的一种牌戏)。该岛的名字似乎有点希奇。“Pedro Island”有被译为“婆罗岛”甚至是“菠萝岛”。不过该岛确与菠萝无关,因为不产菠萝。

③ 郭士立,见本章附注一。

④ 名温施梯(Wanstall)。



私塾读书,而我却不能像哥哥那样,父母偏偏要送我去上洋人的学校,这实在令我大惑不解。更确切地说,送我读私塾比让我去上英文学校,更符合中国的民情和中国人的志趣,而且也更切合整个国家的需要;况且,在中国只有一条途径——中国人所狂热崇拜和追求的——科举取士——通向高官、势力、权力和财富。这样,我只能从理论上分析父亲送我去读西塾的动机,就是当时中外交往正开始发展,我的父母预感到,这种往来不久必将形成浪潮,认为抓住时机送儿子去学习英文是非常值得的,说不准儿子将来会成为一名高级翻译,拥有优越的职位,而跻身于商界或外交界。我认为这就是影响我父母因而积极送我进郭士立夫人教会学校的主要缘由。至于在我后来的生活中终于发生的结果和一系列的事情,都完全听任于上天的旨意,上天支配着我们所有的设想和计划,因为有一整套神圣的因果关系的法则决定着我們的一切。

1835年我刚刚7岁,父亲带我到了澳门。一到学校,我就被带到郭士立夫人那里。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她在我天真无邪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她身材修长匀称,美丽的面庞渗透出坚定和自信;深陷的眼睛净蓝清亮;薄嘴唇方下巴——表示着坚毅果决。她的头发是淡黄色的,眉毛浓浓的。她的外貌特征总汇在一起,会让人一看便知道她是个非常有决断力和有意志力的人。

当她走上前来欢迎我的时候,她身穿宽松多褶的白色长裙(会见发生在夏季),两只袖子圆鼓鼓的像两个大球,为当年服饰。这样的衣着,更使她显得飘逸高大。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一见到她时,就惊愕极了,吓得全身发抖,因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模样奇特的人和这么怪异的服饰。我十分恐惧,紧紧地拽住父亲,躲进他的怀里。虽然她欢笑着来欢迎我,显得非



常和蔼可亲,但我最初并没有对她产生好感。她这个人及新环境都真真令我眼花缭乱,茫然不知所措。实际上,一个新的世界已展现在我的面前。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已不再想家,我对周围环境的新奇感也消退时,她的和蔼仁慈,终于赢得了我的好感和信赖。我开始觉得她更像一位母亲。她似乎对我特别感兴趣。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我幼小无助,远离父母。此外就是我是学校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把我和女学生安排在一起,不允许我混杂在那时还为数不多的男孩子当中。

有一次违规行动,我决不会忘记!它发生在第一学年,就是我企图逃跑。我被禁闭在三楼,楼顶上宽敞的露天阳台就是我和女孩子们惟一的游乐场所。而且,我和女孩子们都不得出门到街上去玩耍,而那些住在一楼的男孩子,却有充分的自由出去活动。我非常羡慕那些男孩子那么地自由,并常常在课后偷偷地溜到楼下去和他们一块儿运动。我感到单独和女孩子们关在三楼,实在不舒服。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一天,我偶然地偷偷下了楼,冒险出了学校,到了码头周围看看,那里停泊着一簇簇小渡船,而这些小渡船对我富于幻想力的幼稚心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为了获得自由,我计划逃跑。学校的女孩子都比我大好多,她们中有几人对我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表示赞同。无疑地,她们同样厌烦了被束缚太紧的生活。我对她们讲了我的计划,她们当中年龄较大的六个人同意我的主意,这就是我独自一人先偷偷地溜出学校,到下面的码头去预订好一只篷的小船,然后我们大家共坐这只船逃走。

第二天早饭后,趁着郭士立夫人去用早餐的机会,我们瞒过大家偷着出来,一齐挤进那只事先雇好的小船里,火速出发,驶向对岸的佩德罗岛。我原打算先带大伙儿到我家,然后她们再分散回到各自的村子里。就在我们横渡海峡已过了一



半里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万分惊恐,我发现有一只船儿正在快速地追赶我们,其速度比我们的快得多,眼看就要追上来了。我们给船工加钱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双桨船无论如何也赛不过那四桨船。所以当我们的船工瞧见那正在逼近的四桨船上有人在挥巾示意时,便停止了竞赛,于是我们全体被俘。接着,惩罚降临了。我们先被列队围绕学校游行一圈,然后又让我们排成一行,笔直地站在教室一端的一张狭长的课桌上,面对全校学生。我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圆锥形纸帽子站在中间,左右两旁各站着三名女生。在我胸前还别着一张大大的方形纸牌,上面写着:“逃跑主犯”;我们在那里整整站了一个小时,直到散学为止。当时我正在经受的折磨是我有生以来最感羞辱的一次,我感到沮丧极了。一些调皮的同学则想从这一展览中寻点乐趣,他们偷偷地对我们挤眉弄眼,做着鬼脸。郭士立夫人还嫌对我们的惩罚不够,于是又令人拿来姜脆饼和柑橘,就在我们的面前分发给那些学生。

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创办于1835年9月,原先仅招收女孩子。在1835年到1839年这段时间里,在马礼逊教育会组织成立和“马礼逊教育会学校”开设之前,将男孩子学校暂时并入她的学校,同时将马礼逊教育会学校赞助金的一部分拨出来以资助这个男校。

这就是我进郭士立夫人的学校之原因,当时我是最早进校的两个男孩子中的一个。由于添设男校,学校就需要临时扩大和调整,郭士立夫人的两个侄女——两位帕克司小姐(Misses Parkes)来到中国,她们的弟弟就是哈里·帕克司先生(Mr. Harry Parkes),<sup>①</sup>他后来因在1864年的第二次鸦片

---

<sup>①</sup> 见巴夏礼,见本章附注二。



战争中功绩卓著而受封爵士,事实上他正是这场战争的挑起人。这两位帕克司姐妹在学校给郭士立夫人做助手。我曾一度有幸得到她们的指导。

后来,由郭士立夫人和她的两个侄女即帕克司小姐主持的男孩子学校解散了;<sup>①</sup>这件事使得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各奔东西,从此分别。郭士立夫人带着三个失明的女孩子——劳拉(Laura)、露西(Lucy)和杰西(Jessie)去了美国。两位帕克司小姐都嫁给了传教士:一位是洛克哈特医生(Dr. William Lockhart),一位医学传教士;另一位是麦克拉奇牧师先生(Rev. Mr. MacClatchy),也是一位传教士。由伦敦布道会赞助,她们在中国辛勤地度过了长长的一段时间。郭士立夫人带走的那三位盲女,曾经由我教她们使用凸字读书法,直到她们能读《圣经》和《天路历程》。

当我一回到家乡时,我马上又开始继续中文学习。

在1840年秋天,当鸦片战争仍在进行之时,我父亲去世了,给我母亲留下四个孩子,家中一贫如洗。

好在我们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已达到能给母亲助一臂之力的年龄。哥哥从事渔业,姐姐帮助操持家务,而我则来往于本村和邻村之间叫卖糖果。我对待自己做的事情非常认真,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6点钟才回家。我每天净得利二角五分钱,全部交给母亲,加上有兄长的鼎力帮助,由他支撑着门户,我们也免于挨饿。我从事叫卖糖果约有五个月,当到了冬尽春来时节,人们不再熬制糖果了,我无糖果可卖,就改做别的事。如稻子熟了,就进稻田里跟在割稻人后面拾落穗。当到较远的地方拾落穗时,姐姐往往陪我一块儿去。

---

① 除了男校解散外,女校也同时解散。学校解散的原因见本章附注三。



当我拾得太少时,我却不能像古时的路得(Ruth)那样有波阿斯(Boaz)的帮助。<sup>①</sup> 可我的英语知识却帮助了我。姐姐告诉那个领头割稻子的人,说我学过英语,既能说能读又能写。这引起了那个割稻人的好奇心。他招呼我过去,问我能否说一些“红头发人”说的话给他听。他说他还从未听过这种语言。起先我还觉得害羞和胆怯,但姐姐鼓励我说:“他会给你一大捆稻子拿回家去的”。姐姐的话一下子提醒了那个割稻人。他立刻变得灵活起来。他对我说,如果我肯说,那么他就给我一大捆稻子,重得我都搬不动。于是我背诵了英语字母表给他听。所有割稻子和拾稻子的人,都停下了活儿,静静地站在那里,他们都高兴地咧开嘴笑着。在泥水齐膝深的稻田里发表完了我的初次演说之后,我则获得了好几捆稻子的奖赏。因为稻子多得我和姐姐俩都拖不动,所以我不得不赶快去找两个男孩子来帮忙。这样,我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家,将金黄色的稻捆交给母亲。我真没有想到,我学到的一点点英语知识在我的生涯中就这么早地派上了用场,那时我不过12岁。即使路得幸得6簸箕麦子(six measures of corn),<sup>②</sup>其机遇也仍不比我更好。

收稻子的日子很短,没几天就都结束了。不久,我的一个邻居正巧从澳门回家来度假,他在澳门一位天主教教士办的印刷所做印刷工。他对我母亲说,那位教士想雇一个懂英语的男孩到印刷所工作,英语要求不高,只要能正确地辨别数

---

① 路得(Ruth)和波阿斯(Boaz)是《圣经》中的两个人物,见《旧约全书·路得记》。年轻女子路得和婆母相依为命,她很善良,对自己的婆母极孝顺,深为人们称颂。在割麦时节,她到财主波阿斯的田间拾麦穗,得到他的帮助。

② 在打麦场上,波阿斯装了6簸箕麦子,让路得扛回家去。他已爱上了路得,后娶她为妻。



字,能把纸张折叠整理好交给装订工就行。我母亲说我能够做这个工作。于是,我去见了那位教士,并签了合同。我回到家把情况告诉母亲,这样没几天我就到澳门当上了一名月薪四元五角的折纸工。扣除膳宿费一元五角,余额三元钱每月按时送交母亲。但我没有在这个职业上很快富起来,因为我在印刷所做工只有四个月,就有人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传来一个召唤,我为此而匆匆辞职。这一召唤中更多的是上天的声音。

召唤来自本杰明·霍布森医生(Dr. Benjamin Hobson),<sup>①</sup>一位医学传教士,他在澳门设立的医院距那个天主教教士的印刷所不超过一英里。他请人带话来说他想要见我,说他已经寻找我好几个月了。我对霍布森医生很熟悉,因为我曾在郭士立夫人那里见过他好多次。于是我就去拜访他。在开始时,我还以为他想要我跟他学医当个医生,但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履行一个诺言,因为郭士立夫人携带三位盲女去美国时,临行前曾特地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中嘱咐他,说一旦马礼逊学校开始招生,不管我在哪里,都一定要找到我,送我去那个学校上学。

“这就是我想要见你的原因,”霍布森医生说,“在你离职以前应先征求你母亲的意见,而且在她同意你去上马礼逊学校后,我希望你能来医院和我在一起呆上一小段时间,以便我在送你进马礼逊学校之前,让我能更好地了解你,学校已开始招生,这样我好把你介绍给老师。”

我同霍布森医生谈话一结束,便匆匆回家见母亲。她给出一些反对意见之后,还是同意了。我随即返回澳门,向

---

<sup>①</sup> 本杰明·霍布森医生(Dr. Benjamin Hobson),见本章附注四。



那位教士辞别。虽然他冷冷淡淡,沉默寡言,我在他那里呆了四个月,他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但在工作中他对我也确实未有过挑剔。离开印刷所我直接去了医院。霍布森医生立即给我安排了工作。他让我研磨,准备制作软膏及丸剂的材料。我还常常端着盘子跟随霍布森医生巡视病人,做着为他们减轻痛苦的慈善工作。就这样我和他在医院一起工作约有两个月,有一天,他终于领着我去见塞缪尔·罗宾斯·布朗教士(Rev. Samuel Robbins Brown),<sup>①</sup>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教师。

#### 附注一: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一译郭实腊。德籍传教士。1831年来中国。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在上海等处贩卖鸦片,并从事间谍活动。1832年2月26日同胡夏米等乘“阿美士德(Amherst)”号船在中国沿海航行,改名查尔斯(Charles),以经商、传教为掩护,专事收集中国沿海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当年9月5日返回澳门。一个月后,又受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重金聘请,乘坐“气仙”(Sylph)号再次从澳门出航,开始更大范围的间谍航行。直到1833年4月底才又返回澳门。短短几年间,曾7次往来于中国沿海各地。后来,英国政府就是根据郭士立等人提供的情报和建议而制订入侵中国的正式计划。1834年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翻译。1836年向义律建议用贿赂扩大对华鸦片销路。鸦片战争期间,任英国侵略军在舟山的“行政长官”。曾随英军北上,担任译员及向导,沿途张贴布告,勒索财物。1842年8月参与签订

---

<sup>①</sup> 塞缪尔·罗宾斯·布朗,见本章附注五。



《南京条约》。后任香港英国当局中文秘书。1847年在香港设立“汉会”(又称“福汉会”),意为汉人“信道得福”,有两名中国牧师协助他以进行传教活动,又被称为“郭士立差会”。1849年返欧,在英荷等欧洲国家宣扬其使中国耶稣教化的计划。1851年死于香港。精通汉语,能说一口闽南话,一生中文著述颇多。

容闳在自传中只谈他对郭士立夫人的好感,却只字未谈论郭士立。事实上,当时郭士立夫妇俩均住在学校里。想必他对郭士立的态度不同于郭士立夫人。

#### 附注二:

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英国外交官。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人。因贫苦无所依靠,1841年来中国,先在澳门学习汉语。次年充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璞鼎查随员,参加鸦片战争。后任英驻厦门、福州、上海等领事馆译员、领事。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期间,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随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北犯。他竭力支持额尔金焚毁圆明园并参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因侵华“有功”,1862年受封爵士。1885年死于北京。

#### 附注三:

学校解散的原因,当与中国的时局有关。1839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长期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不顾中国政府的严禁鸦片输入的禁令,为牟取暴利,大量向中国销售鸦片。英国等国的鸦片贩子还把澳门作为藏身之地和逃离中国的通道。1838年冬,鉴于鸦片走私的日益严重,中国社会因此已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力主禁烟的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



禁鸦片。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在广州发布责令外国烟贩限期尽数呈交鸦片的命令,第二天又发布禁止一切外国商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的通告。同时,切断与澳门之间的一切交通,使软禁于广州的鸦片贩子无法逃脱,并得不到任何消息。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得不命令英国商人向中国官府呈交全部鸦片。但被迫缴烟的义律仍企图将澳门作为新的鸦片囤贮之处。此后竭力攻击中国禁烟政策,拒收中国官府的一切公文,怂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中国使用武力,以保护鸦片贸易。到7月7日“林维喜案”发生后,又蓄意破坏中国法制,拒绝交出杀人凶手。中英关系更加恶化。为惩罚强横的英国人,捍卫中国主权,林则徐决定将他们驱逐出澳门。从8月15日起,开始实施具体驱逐办法,如禁止向英国人提供食物;为英国人服务的买办、工役须在三天内离开澳门;葡萄牙人须向中国官吏提交每日所需食物的清单,经中国官吏核准后发给牌照,由店铺定量供应;附近村落的居民不得携带食物入澳等等。因而英国居民惊恐万状,纷纷逃离澳门。至8月27日,澳门已基本没有英国人的踪影。而郭士立夫人和她的两位侄女都是英国人,自然也必須撤离澳门。

#### 附注四:

本杰明·霍布森医生(Dr.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一译合信。马礼逊之女婿,英国伦敦会传教医生。1839年来华,在澳门伦敦布道会任医师,1843年任该会香港医院院长。后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在上海设立医馆和创办墨海书馆。著作有《博物新知》和《英汉医学词典》等。



#### 附注五：

塞缪尔·罗宾斯·布朗教士 (Rev.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年6月16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东温泽镇, 其父亲提摩西·布朗 (Timothy Brown) 是一位虔诚的公理会教徒。布朗幼受庭训, 童年时即以“获得自由教育, 为落后民族献身工作”为职志。中学毕业于孟松学校 (Monson Academy), 后入耶鲁大学, 于1832年毕业。其后任职纽约聋哑院, 因染肺病, 休假两年。1836年入哥伦比亚神学院, 后转读纽约协和神学院, 1838年毕业, 得神学博士学位, 遂得获美部会遣派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任教。同年10月10日, 与东温泽镇舒贝尔·巴特利特牧师 (Rev. Shubael Bartlett) 之女伊丽莎白·G. 巴特利特 (Elizabeth G. Bartlett) 小姐结婚; 10月14日在纽约第三长老会受按牧师圣职; 17日与新婚妻子由纽约扬帆同来中国, 于1839年2月23日抵澳门, 暂住卫三畏教士 (Rev. Williams Samuel Wells) 家中, 继而学习中国语文; 当年11月正式开办马礼逊教育会学校。1847年初因妻病不得已返美, 同时携学生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赴美留学。1859—1879年在日本从事办学、译书及传教。是“日本亚洲学会”的创始人。日本首批学生赴美留学, 亦由布朗携往美国。他被誉为“新东方的缔造者”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1880年病逝于麻州孟松 (Monson)。



## 第二章 少年学生生活

马礼逊学校于 1839 年 11 月 1 日成立,<sup>①</sup>由布朗教士负责校务。布朗是耶鲁大学 1832 年的毕业生,后来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和夫人是 1839 年 2 月 19 日抵澳门的。<sup>②</sup>从他的经历来说,他是到中国来创办第一所英文学校的最为合适的人选。我在 1841 年入学,<sup>③</sup>我发现已有五个男孩子先我一年进校。他们正在学初等算术、地理学和阅读。我只在英语阅读和发音方面比他们早学一些。我们上午学英语,下午学中文。那五个男孩子的名字是:(1) 黄胜(Wong Shing);(2) 李刚(Li Kan);(3) 周文(Chow Wan);(4) 唐杰(Tong Chik);(5) 黄宽(Wong Foon)。<sup>④</sup>我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龄最小的。我们组成学校的第一班,并且从头至尾,始终从师于布朗,直到他因健康不佳于 1846 年 12 月离开中国。而且在他返回美国时,我们原先六个学生中的一半跟随他来到了这个国家。

马礼逊教育会学校的由来是这样的:罗伯特·马礼逊博

---

① 1839 年 11 月 4 日,布朗夫妇搬到原郭士立夫妇的住所,并正式开办马礼逊教育会学校。

② 据《美部会在华传教简史》,布朗夫妇抵澳门的时间是 1839 年 2 月 23 日,而据容宏回忆则是 1839 年 2 月 19 日,两者稍有出入。

③ 容闳入学具体时间见本章附注一。

④ 有关这五个男孩子情况见本章附注二。



士(Dr. Robert Morrison)<sup>①</sup>于1834年8月1日去世不久,即1835年1月26日,在华外国人发布一份通告,<sup>②</sup>要求成立一个协会,其名称为“马礼逊教育会”,目的是“以办学校或其他方法在中国增进和推广英国教育”。协会以“马礼逊”命名,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人物的业绩,他是由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1807年1月31日,他从伦敦启程,横渡大西洋到纽约,又从纽约乘“三叉戟”号(Trident)帆船往中国。他试图在澳门登陆,但由于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钳制,他的意图遭受挫折,而被迫去了广州。最后,因中国政府和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之间发生了不安定的关系,他又去了马六甲(Malacca),并以该地为他的工作基地。他是第一部四开三卷本的《英华字典》的编纂者,<sup>③</sup>他把《圣经》译成汉文,梁阿发(Leang Afah)<sup>④</sup>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信徒,经他培训后去传教。梁氏后来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布道者。马礼逊先生编纂那部字典和将《圣经》译成中文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为后来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作出了基础性的和卓越的贡献。他的信徒梁阿发,同样在传教工作中为开创中国宗教生活的新时代贡献不小。因此,马礼逊是值得纪念的,建立一所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学校,使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其实,应该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大学来纪念马礼逊,而不是一所小学校,因为小学校的生存完全由暂住在中国的那些外国商人所给予的不稳定的临时性的赞助来决定的。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结束后,香港割让给了英国,马

① 马礼逊,见本章附注三。

② 此通告内容见本章附注四。

③ 即马礼逊在1815—1823年编辑出版的《华英字典》。

④ 即梁发,一称梁亚发,见本章附注五。



礼逊学校遂于 1842 年搬到香港。<sup>①</sup> 校址选在一座高出海平面 600 英尺的山顶上。此山坐落于维多利亚殖民地(Victoria Colony)之东端,后来它随学校的名字而被称为“马礼逊山”。站在山巅,俯视由东向西延伸的港口,港口全境的景观则一览无遗。正是由于这个港口,香港才成为最为外人垂涎的南部中国的一块割让地。该港口为一水域宽阔的深水港,足以容纳英国舰队,也正是它本身具有的这一突出特点及其战略位置,它才终为英国占领。

1845 年 3 月 12 日,威廉·艾伦·麦希先生(Mr. Wm. Allen Macy)到达香港,在学校任助教。他来得很及时,因为学校由澳门迁入香港后已扩大了好多,增加了三个班级的新生,总共有学生 40 多名。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非常需要有个助手。布朗继续在学校工作直到 1846 年秋天。麦希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适应学校的工作。

布朗和麦希两人在气质和性格方面差异很大。布朗在各方面都显示出他是个自强自立的人。他性情沉静,处理问题熟练灵活,为人温文尔雅,令人愉快,是个乐观的人。他毫不费力地就能讨学生的喜欢,因为他同情和支持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在教学中他具有天生的才能,其授课言简意赅,直截了当,通俗易懂,学生一听就明了。虽然他非常能干,但他作为教师的大部分经历,在来中国之前,甚至在他进大学之前就已具备。因为他很了解男孩子的性格,所以,无论是中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的,他都知道怎样去管理他们。学生都把他看作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从他的性格和天赋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成功的教师。

---

<sup>①</sup> 1842 年 11 月 1 日,马礼逊学校迁入香港,随校来港继续学业的有 11 人。



他后来在纽约奥本(Auburn)和在日的教学经历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

助教麦希也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以前从未担任过教学工作,也没有这种机会。这样,他到中国后,则没有丁点儿教学经验以指导他新的工作。他显然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是个天性灵敏并有着良好的道德情感的人——是个真挚热情和具有崇高理想的人。

在1850年马礼逊学校解散以后,麦希和他的母亲一起回到美国,<sup>①</sup>他进入耶鲁大学神学院,从事神学研究。1854年,他受美国教会的派遣,返回中国传教。当时我已由耶鲁大学毕业,于是我和他同道回中国。我们从桑迪胡克(Sandy Hook)启程到香港,在那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154天的航行中,我们俩是仅有的旅客。

布朗于1846年冬天离开中国。在动身前四个月的一天,布朗突然宣布一个令全校震惊的决定。他说,由于他本人及家属的健康原因,经过慎重考虑,他准备返回美国。同时他告诉学生们,他对这个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很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一同赴美,使他们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之后,就请愿意随他一同去美国的学生起立示意。布朗决定离校返美并携带几位学生一道走的消息一经宣布,刹那间全校笼罩了一层忧郁的阴影。接着,死一般的寂静向我们袭来。自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谈论的中心都是布朗长久离开学校的话题。而在我们中间只感到快乐的,惟有那些决定跟随布朗去美国的,这就是黄胜、黄宽和我。当他要求那些

---

<sup>①</sup> 布朗回美国后,麦希一人主持校务。1847年4月,麦希的母亲从美国来到香港,并从1848年负责照管第四班,从而减轻了麦希的负担。



愿意随他去美国的人起立示意时,我第一个站起来,黄宽第二,随后是黄胜。布朗告诉我们必须回家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最后决定下来。我母亲起初极不乐意,经我竭力劝说,她才非常勉强地答应下来,但免不了离愁别绪,悲伤落泪。我开导她说,除我之外,她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留在身边予以安慰,而且哥哥即将结婚,这样又将有儿媳来照应她。

因为我们都是穷苦孩子,若想依靠我们自己的财力,那么,不用说,我们是决不可能去美国完成教育的。无疑地,布朗在未宣布回国之前,他必定与学校的理事会<sup>①</sup>专门研究过他将携带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待留学资金有着落后,他才向学生提出谁愿意随他赴美留学这一重大问题。

也正是通过他的影响,在我们赴美留学期间,我们的父母也得到了至少两年的生活资助。承担我们一切费用的那些资助人,原打算让我们在美国留学不超过两年。我们的资助人对我们很慷慨。他们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他们为我们支付了一笔不小的留学经费,而且还供养我们年迈的父母。在那些资助人中,我仍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是:《香港中国邮报》(Hong Kong China Mail)<sup>②</sup>的业主兼主笔安德鲁·肖特里德(Andrew Shortrede)(他是苏格兰人,一个老独身者,一个高尚慷慨的博爱主义的典范),美国商人 A. A. 里奇(A. A. Ritchie),和苏格兰人 A. A. 坎贝尔(A. A. Campbell)等人。还有一些我不曾知道姓名的资助人。奥立芬家族公司

---

① 此处的“trustees of the school”,译成“学校理事会”比“学校董事会”更为确切些,因为学校经费为赞助、募集而来,并无固定董事及董事会,后就是因为经费困难而停办。托管学校的理事会组成成员,是那些马礼逊教育会的成员或学校经费赞助者。

② Hong Kong China Mail: 见本章附注六。



(Olyphant Sons)的戴维(David)、塔宝特(Talbot)和罗伯特(Robert)三兄弟,是美国纽约最知名的商人,他们让我们免费搭乘他们的装载茶叶的“女猎人”号(Huntress)帆船从香港到纽约。尽管今天我提起这些完全出于纯粹基督慈善之心以帮助我求学的捐助人的名字为时已晚,但如果他们的后代——尚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得知他们的先辈曾为了培养三名中国青年——黄胜、黄宽和我作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那么他们会从中得到一种快乐的。

#### 附注一:

关于容闳入马礼逊学校的时间,容闳在自传中先说是1841年,后说与黄宽自1840年在澳门马礼逊学校相识(见容闳英文自传第13页、第33页)。笔者根据容闳所回忆的童年经历,特地到他家乡请教当地的一些农民,主要想弄清两件事:一是当地收割稻子的时间,二是当地熬制糖果的时间。经了解获知,当地一年两季稻,即夏季和秋季,夏季割稻在小暑和大暑之间,半个月收清,公历为7月上旬至中旬;秋季稻从立冬开始,半个月收清,公历为11月上旬至中旬。关于制作糖果,当地传统方式是以甘蔗为主要原料,也有用番薯等粮食的,一般从农历八月中秋开始熬制,到正月十五止,其原因,一是秋冬甘蔗等成熟,二是自中秋起节日也多。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人们就不再制作了。从中秋到元宵节为四个月(现在当地仍有按传统习俗和方式熬制糖果的)。容闳说他的父亲容丙炎是1840年秋去世,当时鸦片战争仍在进行。父亲去世后,由哥哥支撑门户,他自己则卖糖果,大约卖了五个月,因为冬季一过,就没有熬制糖果的了。这说法与当地习俗相符,从时间上也差不多吻合。容闳在割稻时



节拾落穗的事,他自己说是冬季过了,无糖果可卖,只好干别的,到稻田里拾落穗,没多久就拾完了。这一说法有出入。他应该在公历7月里或11月里拾稻穗。要么是1840年11月拾稻穗,要么是在1841年7月拾稻穗。他拾完稻穗后,不久,就到澳门天主教教士印刷所做工,四个月后就辞职,为的是上马礼逊学校。如果是1840年11月拾稻穗后,接着卖糖果至正月十五以后,去澳门做工,那么四个月后就大约是1841年春夏之交;如果是1841年7月拾稻穗后去澳门做工,那么四个月后就差不多是1841年11月。所以,按容闳的回忆,他进马礼逊学校的日期或是1841年春夏或是1841年11月。这是根据容闳的父亲1840年秋去世为时限来推断的。因他父亲去世,他才卖糖果、拾稻穗和做童工。他父亲去世当是“刻骨铭心”之事,又逢鸦片战争进行,应该不会记错。这样,1841年春夏入学比较符合容闳自述。但根据布朗先生在1843年12月公布的学生名单,名单中有Awing,是1840年11月入学的,被学界认为是容闳,这该是可信的了。(见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倘若容闳因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而淡忘某些日子,也丝毫不影响他童年的凄惨辛酸的经历。

## 附注二:

容闳所说的五个男孩子,其中黄胜和黄宽是后来与容闳一起跟随布朗赴美留学的;李刚生平未详;周文后来入林则徐幕,译英文书报,魏源据此增扩《海国图志》;唐杰也未见到确切的生平事迹。不过,他似乎一直被认为就是唐廷枢(例如勒法吉著、高宗鲁译注的《中国幼童留美史》第14页,即说“唐杰成为巨商,曾创办中国第一个‘轮船招商局’,他同时协助中国自建铁路,并



发展新式的开平煤矿”)。但有资料表明,唐廷枢比容闳小四岁,比容闳晚入马礼逊学校,是1842年才入读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并且是与哥哥唐廷植、弟弟唐廷庚同时进校的。唐廷枢兄弟四人,他居二,父亲唐宝臣,母亲梁氏。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经港英当局许可,马礼逊学校遂于1842年11月迁离葡萄牙人占统治地位的澳门而迁入香港。当时,唐宝臣适在布朗处打工。由于他渴望儿子们能进入该校读书,就与布朗签订为期八年的变工契约,作为三个儿子即唐廷植、唐廷枢和唐廷庚的入学条件。<sup>①</sup>而马礼逊学校的学制正是八年。学生入学以后必须保证在校学习八年,学完之后达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sup>②</sup>若是这样,那么唐杰则该是另一个人了。不过,即使唐廷枢与容闳不同班,但同窗同学应是无疑问的。[唐廷枢,字建时,号景星,又作镜心,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32年出生,1842年入香港马礼逊学校,毕业后在香港巡理厅及大审院充当译员。1859年任上海海关总翻译。1861年受雇于上海怡和洋行,1863年提升为总买办。1870年主持怡和洋行新设的船务部。1873年由李鸿章委派为轮船招商局总办。1875年会办上海洋务局。1877年任开平煤矿总办,曾主持修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5年始专管开平煤矿。为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之一。编著有《英语集全》。1892年10月7日病逝于天津。]

① 资料来源:唐佑钧:《关于唐廷植生平》,载于《珠海文史》第八辑;《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第419页。

② 吴义雄:《马礼逊学校与容闳留美前所受的教育》,载于吴义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598页。



### 附注三：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英国英格兰人, 属长老会。1805 年(嘉庆十年)被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选派来中国, 于 1807 年 9 月 8 日到达广州。来华后努力掌握汉语, 仿效中国生活方式, 并将自己的名姓译成汉字马礼逊。1809 年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任职 25 年, 并行医传教。曾将基督教圣经译成汉文, 于 1814 年出版《新约全书》, 1823 年出版《新旧约全书》, 为最早汉文本圣经。1815—1823 年编辑出版《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8 年曾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1842 年底迁入香港)。1824 年回国, 谒见乔治四世, 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6 年再次来华。1816 年及 1834 年, 先后任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及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汉文正使兼翻译官。曾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中国自设法庭, 以取得治外法权。他是西方国家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1834 年 8 月病死于广州。其妻编有《马礼逊生平事业回忆录》。

### 附注四：

马礼逊去世不久, 他在广州和澳门的朋友即有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育团体之议。1835 年 1 月 26 日, 他们发布了一份 22 人签名的通告, 宣布打算成立“马礼逊教育会”, 并很快募集到 4 860 元的捐款。为进一步推动计划的实施, 由英国商务监督罗便臣、英商查顿、美商奥立芬、英商颠地、马礼逊之子马儒翰和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 6 人, 组成了筹办“马礼逊教育会”的临时委员会, 并决定在理事会成立以前以英商怡和洋行为司库, 裨治文为马礼逊教育会秘书。1835 年 2 月 25 日, 临时委员会在广州又



发布一份《通告》，要求人们在财力上支持创立“马礼逊教育会”。经过一系列筹备，1836年1月9日，在广州商馆正式宣布成立“马礼逊教育会”。该会成立的目的是：以教育为手段，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在存在了16年之后，该会解散。

#### 附注五：

梁发(1789—1855)，一称梁亚发或阿发，号学善者，别署学善居士。广东高明(今高鹤)人。1804年，至广州当雕版印刷工。1810年起，为来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雇，刻印《圣经》汉译本。1815年4月，被英国传教士米怜(Wm. Milne)雇往马六甲印书。次年11月，受洗入基督教。1819年回家，著《救世录撮要略解》，劝告应崇信基督教，被捕罚款。1823年12月，在澳门被马礼逊派充宣教士，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他多次致书英国伦敦布道会，称中国人民为“罪恶所迷惑”，要求多派传教士来华。1828年，在高明与一教徒合设书塾藉以传教，被斥为宣传迷信和卖国后逃往澳门。1830年后，返家写《真道寻源》、《灵魂篇》及《异端论》，并至高州传教。1832年在广州撰《劝世良言》。1834年，赴广州向应考士子散布布道书时被捕，半途逃脱，潜至澳门，再次出洋往新加坡、马六甲，在华侨中传教。1839年，回广州继续传教。1855年病死。

#### 附注六：

《香港中国邮报》(Hong Kong China Mail)，又译《德臣报》或《德臣西报》。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1845年2月20日肖特里德创办并任主笔。初创时得颠地洋行支持，1848年还曾创办发行于欧洲的“大陆版”。1856年德臣成为该报肖特里德公司的



股东,并任主编。1858年肖特里德去世,德臣成为惟一的业主,中文译名即由此而来。1906年改由德臣报公司经营。1855年增出《香港航运录》。1859年又增出《香港杂录报》。1872年发行中文版《华字日报》。1967年中文名改为《中国邮报》,1974年8月18日停刊。



### 第三章 前往美国及最初经历

就这样,由于得到多方慷慨资助,1847年1月4日,我们由广州黄埔港乘坐吉勒斯帕(Gillespie)船长的那艘坚固华丽的“女猎人”号(Huntress)帆船前往纽约。正如上面提到的,这艘船属于奥立芬兄弟公司所有,正满载着茶叶。当时我们恰巧遇上非常有利的东北贸易风,<sup>①</sup>从黄埔港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sup>②</sup>这种风一直在强劲而平稳地吹着。这样,除了在绕行(南部非洲的)好望角时碰到一阵狂风以外,我们这一路航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当时那狂风在我们身后恶煞般地哀嚎、呼啸,好像一群无形的古希腊复仇女神在追踪着我们。<sup>③</sup>因为在船的桅顶和帆桁<sup>④</sup>端部都装有电石气球形灯(balls of electricity),<sup>⑤</sup>因而,那些电石气球灯(the electric balls)被风吹得在帆桁端部和桅顶拼命地摇荡着,在漆黑的夜晚,就像许多冥灯在黑夜中闪现。呈现于眼帘的这一凄惨悲凉的景象,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中,至今仍历历

① 或称信风。

② 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位于南大西洋,全岛面积122平方公里,1659年英国占领此岛,1834年开始成为英国独占殖民地。

③ 好望角这个海峡附近风浪极大,因此又被称为“风暴角”。

④ 桁(héng):横木。

⑤ 此处的“balls of electricity”,被译成“电灯”,惟恐有不妥,因为容闳1847年初赴美留学,而1879年10月21日,美国爱迪生才发明电灯,相隔30多年。所以,在电灯未诞生前,航海所用应为电石气灯,其主要成分是可燃气体乙炔。



在目。尽管帆船正颠簸飘摇在发出阵阵呻吟声的惊涛骇浪之中,然而,我却一点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所以,我反而对那狂野和怪异得不可思议的场景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在绕过好望角以后,帆船驶入了比较平稳的大西洋水面,直到顺利地抵达圣赫勒拿岛,我们必须在这里停泊,以补充淡水和粮食。大多数由东方驶向大西洋岸的帆船,都习惯把这儿作为临时停泊之处。当从船上遥望圣赫勒拿岛时,它的外形看起来是一座荒芜贫瘠的火山岩,就好像刚从火与硫磺的洗礼中浮现出来一样。它那被烧焦毁坏的表面,已是光秃秃地草木不生。我们从詹姆斯镇(Jamestown)登陆,这是该岛山谷中的一个小镇。当我们走进山谷里,展现在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草木繁茂,青葱翠绿,着实喜人。我们在这稀少的居民中居然发现了几位中国人,原来他们是随“东印度公司”<sup>①</sup>的船来到这里的。他们都已到中年,都已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从这里,我们又特地去朗伍德(Longwood)视察拿破仑<sup>②</sup>的墓地。在冷僻寂静的荒野,坟墓早已荒芜,只是在墓地尚耸立着一棵高大的垂柳树,浓密的柳枝垂悬下来,在墓的上方随风摇曳着,轻轻地扫拂着。我们折下几枝细嫩柳条,小心地培植起来,一直带到美国,并且由布

① 圣赫勒拿岛是英国殖民地,此处则专指英国东印度公司。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特许设立的对东方(主要是印度和中国)经营垄断贸易及进行殖民事业的组织。初在马来群岛一带进行香料贸易,1757年爆发印度和英国的普拉西战争,印度战败,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自1757年起,以印度为根据地,从事鸦片专卖和制造鸦片的垄断活动,对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从而大肆掠夺中国财富。产业革命后,英国政府为适应新兴工商业资本“自由贸易”的要求,1858年撤销这一垄断性的东印度公司。

② 拿破仑(Napoleon, 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15年6月18日,欧洲反法联盟最终打败拿破仑。从此他被终身流放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小岛上,直至1821年去世,死后则葬于该岛。



朗先生把它们带到纽约奥本(Auburn, N. Y.),种在他的住宅附近。布朗先生在奥本学校做了几年的教学工作之后离职去了日本。<sup>①</sup>当我在1854年参观奥本时,那几株柳枝都已长成相当漂亮的大树了。

从圣赫勒拿岛启航,我们的航线转向西北方,向墨西哥湾的方向前进。当驶入墨西哥湾流后,风向依然顺利,非常有利于航行,这样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到了纽约。在经历了98天的绝少的晴朗天气之后,我们于1847年4月12日在纽约上岸。1847年的纽约和今天1909年的纽约完全是两样的。当时它仅是个拥有25万到30万人口的城市,现在它已变成一个在人口、财富和商业方面都可与伦敦相匹敌的大都会。整个曼哈顿岛(Manhattan Island)<sup>②</sup>已成为一座布满摩天大楼、教堂和宏伟富丽住宅的城市。

1845年当我还在马礼逊学校读书时,我曾写过一篇作文《溯哈得孙河遨游纽约之幻想》,但那时我根本想不到自己以后会真的置身于纽约城中。这件事不禁引起了我的沉思:我们的幻想有时预示着深藏于我们头脑里的意愿,并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中国留学生教育计划是我毕业前一年产生的幻想,是幻想变成现实的另一个例子。而我娶了一个美国妻子,则也是幻想得以实现的又一佐证。我仍有许多幻想等待着实现,它们是否能成为现实,我想还是等待未来去决定罢。

我们在纽约作了短暂停留。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非常幸运地最早结识的朋友是戴维·E. 巴特利特教授(Prof.

---

① 布朗于1859年赴日本,1879年携日本首批学生赴美留学,1880年因病在美国去世。

② 美国东部哈得孙河口的岩岛,为纽约市中心。



David E. Bartlett) 夫妇。<sup>①</sup> 巴特利特是纽约聋哑院教授, 后来在哈特福德城一个相似的机构任职。他于 1879 年逝世。其妻子是范妮·P·巴特利特夫人(Mrs. Fanny P. Bartlett),<sup>②</sup> 她孀居近 30 年, 在 1907 年春故世。巴特利特夫人具有高尚的基督教人格, 她始终不懈地为公众利益而工作着, 因而, 她非常受人敬重和爱戴。她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中国, 因为曾有几名中国学生恰巧受到了她的关爱和教诲。我把她算作我最宝贵的美国朋友中的一个。

我们从纽约乘船到纽黑文(New Haven), 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参观了耶鲁大学, 并有幸见到了戴校长(President Day)。当时我没有丝毫的奢望想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的一名毕业生, 就像几年以后我毕业于耶鲁大学那样。我们乘火车离开纽黑文, 经过威哈斯角(Warehouse Point), 到了东温泽(East Windsor), 这里是布朗博士的妻子伊丽莎白·布朗夫人(Mrs. Elizabeth Brown)的家乡。<sup>③</sup> 那时她的父母都还健在。她的父亲舒贝尔·巴特利特教士(Rev. Shubael Bartlett), 是东温泽镇公理会<sup>④</sup>的牧师。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他的教堂安息日祈祷的情景。我们三个中国男孩子坐在布道坛左侧的牧师座位上。从这个方向只能看到牧师的一个侧面, 但却可以看清全体会众, 他们的神情尽收眼底。我们仨人成为全教堂人所注视的目标。我想那天人们根本没注意听牧师的讲道。

① 戴维·E·巴特利特(David Ely Bartlett)教授, 是布朗夫人的哥哥, 当容闳一行抵达纽约时, 这对夫妇曾到码头迎接他们。

② 当年中国留美幼童吴仰曾、黄开甲、梁敦彦等八人, 均曾寄住在她家。

③ 布朗先生也出生在东温泽。

④ 公理会(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为基督教一教派。



舒贝尔·巴特利特教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纯粹的老一辈新英格兰<sup>①</sup>清教徒<sup>②</sup>的典范。他的一切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都相当严谨精确。他说话的语调是那么不慌不忙而又显得审慎严肃,但却充满了真挚和热诚。他持身严正谨慎,如履薄冰。从他的外表上看,会以为他是个严厉苛刻的人,其实他非常善良和善于体贴别人。每天早晨,他总是把他的家庭用大型《圣经》<sup>③</sup>和《赞美诗集》这两部书方方正正地擦在一起,放于桌上的同一个地方,以准备晨祷。而晨祷时,他也总是坐在同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人们总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有如时钟,十分有规律。我从未听到他说过玩笑话或纵声失笑过。

布朗夫人的母亲巴特利特夫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她总是快快乐乐的。她几乎一直都面带喜色,一天到晚地不管和谁说话都充满着友爱和愉快,她那甜美的声音总使人感到她心地的快乐和仁慈。她性情温和,待人亲切,又非常好客,因而这所牧师住宅则成为特别受人喜爱的地方,牧师夫妇一家人的所有亲戚和朋友构成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他们经常到牧师家做客和聚会。当时牧师的收入是微薄的,一年不超过400元美金,而这位老夫人却如此热情周到地款待亲朋好友,那么她怎样量入为出而使收支相抵呢?对此我曾一直迷惑不解。诚然,他们的农场每年还有些收入可供补贴。可

---

① 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为美国东北部六州的总称,即缅因(Maine)、佛蒙特(Vermont)、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罗得岛(Rhode Island)和康涅狄格(Connecticut)六州。

②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最先来到美洲的拓荒者,他们开发的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所以他们被称“朝圣者”,他们的宗教强调艰苦工作和服从,反对奢侈和懒惰。

③ 家庭用大型《圣经》,它附有空白页,供记载家属生死、结婚事项用。



是,这对老夫妇的支柱——他们的最小儿子丹尼尔(Daniel)却必须勤奋工作,以维持牧师住宅的声誉。当我就读于孟松学校及耶鲁大学期间,正是在这所牧师住宅里,我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家。<sup>①</sup>

---

① 容闳将其在美国出生的长子取名为 Morrison Brown Yung,以感激和纪念马礼逊和布朗二人;将次子取名为 Bartlett G. Yung,以感激和纪念巴特利特家。



## 第四章 在孟松学校

我们在东温泽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然后就去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城,在那里进了孟松学校。那时,在高级中学兴办之前,孟松学校则曾是新英格兰的一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纷纷云集在这里,以经历进入大学的准备。<sup>①</sup> 孟松学校之所以蜚声全国,是因为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非常幸运地拥有那些富有个性和经验的人士担任校长。查尔斯·哈蒙德教士(Rev. Charles Hammond)就是其中之一。哈蒙德校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自力成功的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酷爱古典作品,<sup>②</sup>是一位真正的英国文学鉴赏家。他胸襟开阔、见解开明且极富有同情心。他是新英格兰最知名的教育家,是一名倡导戒酒和弘扬新英格兰美德的先锋战士。他德高望重,为人们所敬仰,因而使得孟松学校享有一个更为广泛的声誉。这样,自他担任校长以来,学校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昌盛。他对我们三位中国学生——黄胜、黄宽和我本人特别地感兴趣——不是因为学校有了三名中国学生是件新奇的事,而是他对中国怀有好感,他希望我们在孟松学

---

① 孟松学校初创于1806年,该校的黄金时代是1835年到1885年。而后美国公立学校兴起,私立学校渐趋没落。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康州高宗鲁教授亲访孟松城,称“小镇清静幽雅,教堂钟声铿锵,‘孟松学校’已合并他迁,但校舍仍存。布朗校长之母亲故居仍在,布朗校长已葬于此。”(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第27页)

② 还可理解为“经典著作”(the classics)。



校能学有所成,希望我们所受到的教育能对中国有所裨益。<sup>①</sup>

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我们被安排在英语部。我们学习的课程有:算术<sup>②</sup>、英语语法、生理学、心理哲学。<sup>③</sup> 后两门课程则由新来的女教师丽贝凯·布朗小姐(Miss Rebekah Brown)讲授。布朗小姐毕业于霍利奥基山(Mt. Holyoke)学校,她毕业时,曾代表全体毕业生向学校致告别词。后来她成为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城的麦克莱恩博士(Doctor A. S. McClean)的妻子。布朗小姐性情平和温柔,是一位极有善意和善行的人。她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而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集基督徒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她和她的丈夫——一位好心的博士,对我非常真诚,我曾在他们家度过一些假期。在我读耶鲁大学时,他们多方给我帮助,支持我奋力拼搏以至完成学业。我毕业回国后,一直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系,直至我第二次来到美国,他们又总是热诚地邀我到斯普林菲尔德他们的家中做客。正是由于这一真挚的友谊,因而当我在1872年带领第一批中国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时,则将斯普林菲尔德作为我的总部了。

布朗把我们托付给他的母亲菲比·布朗夫人(Mrs. Phoebe H. Brown),请她照料我们三名中国学生。我们在菲比·布朗夫人家里搭伙,但不与她住在同一寓所里,而是住在

---

① 当时容闳等三人只准备在孟松学校读书,毕业后即回中国,因为他们的资助人没打算让他们上大学。

② 此处原文为:格林利弗(Greenleaf)算术。

③ 此处原文为:厄普哈姆(Upham)精神哲学或心理哲学(Mental Philosophy)。布朗将容闳、黄宽和黄胜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的学习情况寄往香港马礼逊教育会,称他们三人学习算术、拉丁文、希腊文、文法、生理学、心理学等,各科成绩殊佳,甚至胜过多数相同年龄的美国学生。(香港马礼逊教育会1847年度报告,转引自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六期。)



街正对面的一个独用的房间里,正好与她的住宅相对。当时她的孀居的女儿带着三个男孩占用了她住所的所有空房间,这样,她实在腾不出房间供我们居住。

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初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一元二角五分美金,不过我们得自己料理房间。在冬季里,自己锯木劈柴取暖,我们感觉这一劳动非常有益于身体锻炼。

我们的住处距学校有半英里远。当隆冬严寒雪深3英尺的时候,我们每天上学也得往返三次,这给了我们充分的锻炼机会,使得我们有极好的胃口,身体也锻炼得结结实实的。

每当回忆起我与菲比·布朗夫人相处的日子,我就百感交集,对她充满深深的崇敬之情。她的确是一位非凡的新英格兰女性——一位在道义和宗教品格方面具有无比力量的妇女。我相信,凡有幸能读过那本极为珍贵的关于她的激动人心的传记的人们,都将证明我所说的全属事实。她经受了世间种种灾难与不幸的考验,度过了人生一段又一段最痛苦最艰难的岁月,锤炼出她那罕有的顽强意志和直面人生的乐观态度,她成为新英格兰上空最光辉灿烂的明珠之一。她是那首为人们所熟知的赞美诗的作者,诗中唱的“我爱从每一个烦累的忧愁中溜掉片刻”等等,整首诗无论唱到哪一句,都表达出她那种安命乐天、无怨无悔的平静的人生境界。

当我们成为孟松学校的学生时,该校校长是查尔斯·哈蒙德教士,他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如同我在前面已陈述的那样,他是一个具有极好的文化素养和优雅情趣的人。他是莎士比亚的热烈赞赏者,莎士比亚是他最喜爱的诗人。在演说家当中,他特别喜欢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方面,他具有激励学生热爱美好事物的才能。在我们每天的文学作品精读课上,他除了给我们讲授语法规则、语气和时态外,更多的则是强调指出一个句子的美妙之处和它的结构。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演说和讲道,其语言既尖锐深刻又富于生活情趣,就像英国英格兰拉格比公学的阿诺德博士(Dr. Arnold of Rugby)一样,<sup>①</sup>其目的在于造就学生的品质,而不是要把学生变成活的百科全书或聪明的鹦鹉。正是在哈蒙德校长的教诲和引导下,我开始涉猎大量的文学作品,例如艾迪生(Addison)、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狄更斯(Dickens)、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麦考利(Macaulay)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大文豪的作品以及《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s),这些是我在孟松学校时读得最多的著作。<sup>②</sup>

在孟松学校的第一年,我还没有想进大学继续深造的打算。这很容易理解,我将在1849年底返回中国,因为拨给我们的资助经费就计划到那时终止。1848年秋天,在黄胜<sup>③</sup>——我们三人中年龄最大的因健康状况不佳返回中国外,剩下黄宽和我将继续学习一年。从这时起,我们俩开始经常商量关于规定留学期限结束后的未来计划。我们最后都决定留在美国继续学习,但问题也出来了。如果我们在1849年以后仍继续学下去,那么谁将在资金方面支持我们呢?这是问题的关键。于是,我们就此决定去找哈蒙德先生和布朗先生商量。他们俩都决定把问题提交给在香港的我们的资助

---

① 拉格比公学(Rugby)在英格兰的拉格比市内。阿诺德博士即是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② 诸位大作家及《爱丁堡评论》,见本章附注一。

③ 黄胜,见本章附注二。



人。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若我们希望在 1849 年以后从事专业学习,而且我们愿意到苏格兰进爱丁堡大学完成一门专业的学习,那么他们将很乐意继续资助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慷慨高尚的建议。

黄宽经历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并拟定于 1849 年底去苏格兰。我的决定则与他不同。我更愿意留在美国,希望进耶鲁大学。黄宽的这一决定免除了他所有的经济上的担忧。而我在 1849 年以后将如何支付学费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不过,我不想让未来的窘困扰乱我平静的心境。我把自己的一切忧虑都抛到了脑后,相信贤明的上帝会像过去关心我一样,而关心我的未来。

我和黄宽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当 1849 年的学年结束后,我们便放下英语的学习,而于同年秋天开始学习我们的标准课程的基础知识。<sup>①</sup> 1850 年夏天,我们从孟松学校毕业。黄宽按照原先安排,直接去了苏格兰,进了爱丁堡大学。我留在美国并最终进了耶鲁大学。我们自从 1840 年第一次在澳门马礼逊学校相识以来,成为既同校又同班的同学已整整十年,而现在我们的链环终于断开了。

黄宽在大学读了七年。1857 年,他完成医学专业学习后,作为一名医生回到了中国。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曾在爱丁堡大学医疗专业班以第三名的好成绩毕业。他在医学界也是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才智和技术使他牢固地享有令人羡慕的声望,那时他被誉为是好望角以东的技术最精湛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之一。他在广州作出了一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成为一位著名的医生。留居广州的外国人都把他优先于

---

① 即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而准备的课程,说明见本章附注三。



欧洲人医生,更愿意请他治病。他在事业上是相当成功的,生前创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他逝世于 1879 年。<sup>①</sup> 中外居民对于失去他这位好医生,均深感惋惜。他的基督教人格和清正纯笃的一生,深受中外人士的敬佩和赞美。<sup>②</sup>

#### 附注一:

艾迪生(Addison, 1672—1719): 英国散文作家、剧作家、诗人,英国期刊文学创始人之一。著有悲剧《卡托》、诗歌《战役》等。

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 1730—1774): 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Samuel Johnson 博士文学俱乐部成员。主要著作有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长诗《荒村》、喜剧《委曲求全》、散文《世界公民》等。

狄更斯(Dickens, 1812—1870): 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笞英国 19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

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主要作品有长诗《玛密恩》、《湖上夫人》和历史小说《威弗利》、《艾凡赫》(旧译《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等。

麦考利(Macaulay, 1800—1859): 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辉格党议员, 1834 至 1838 年曾任职于印度总督府最高委员会, 1839 至 1841 年任英国陆军大臣, 1846 至 1847 年任英国军需总监。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

① 根据本书附录“杜吉尔牧师的演说”, 知黄宽于 1878 年 10 月 15 日去世。

② 黄宽, 见本章附注四。



莎士比亚(Shakespeare, 1564—1616): 英国剧作家、诗人。流传有 37 部戏剧、154 首十四行诗和两首长诗, 主要作品有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 历史剧《理查三世》、《亨利四世》, 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汉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等。

《爱丁堡评论》(the Edinburgh Reviews): 欧洲启蒙运动促成了其杂志业的开端。创办于 1802 年的《爱丁堡评论》, 其创办人均是相当年轻且具有良好修养的穷书生, 是一群致力于打破传统的新型知识分子。该杂志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低级商业模式的奴役, 也根本区别于那些仅仅迎合于人的低级需要和麻醉人的智力生活的杂志, 而坚持对新的知识领域进行探索, 选择新鲜而非陈腐的语言方式, 所以, 《爱丁堡评论》偏重于有教养的读者。在 19 世纪初, 谈论《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 则成为英国有教养家庭的日常练习。虽然《爱丁堡评论》的主办者是富于理想的知识精英群体, 但他们长于与普通人交流。该杂志具有鲜明的独立精神, 具有浓重的理想色彩, 其宗旨是力图改变现实, 而非迎合现实。该杂志强调人的理念, 即强调尊重人的智力生活, 相信这世界具有崇高的情感; 相信艺术的力量, 强调心灵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的粗陋; 更坚信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 人的天才与创造性高于一切。它属于呼唤人的崇高情感、激发人的创造性的杂志。(只是该杂志标价昂贵, 每本约 5 先令, 只有富裕的人才购买得起。)

## 附注二:

黄胜(1827—1902) 名达权, 字平甫,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48 年秋因病自美国回中国后, 则一直从事近代报刊书籍的出



版印刷工作多年。1849年,被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聘为香港英华书院设印刷所监督。曾在《德臣西报》(CHINA MAIL)社学习经营管理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书局总管。当时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和中国学者王韬合作翻译中国经典为英文,他在印刷上做了很多工作,深受理雅各的赏识和感激。1871年伦敦会决定解散该会印书局,他与王韬一起,集股1万元墨西哥鹰洋买下该印书局的印刷设备和活字,成立中国人自己的“中华印务总局”。为了集中精力办这个印务局,他辞去在伦敦会长达20年的职业,主持局务。该局承印活字版各种书籍,无论中西文,一律代印,开创了中国人自办近代印刷业的先例。1872年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同一时期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谈及黄胜与王韬担任《华字日报》主笔时的文采:“其主笔黄平甫及王君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sup>①</sup> 1873年,北京开设西法印书局,他亲自携铅字送往北京,呈交总理衙门,对京师西法印刷业创立时期作出技术援助。同年,以同知衔带领第二批中国幼童赴美,事毕后返国。1873年底,他协助王韬将中华印务总局改为《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创刊的《循环日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除星期天外,坚持按日出版,且它的政论色彩很浓厚。《循环日报》成了中国近代进步人士鼓吹变法自强的第一家报纸,也是中国第一份政论性的报纸,是中国人自办报纸以来最为成功的一例。在洋务运动初期,曾受到洋务大员丁日昌之请,帮助翻

<sup>①</sup>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译西书,以获取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知识。于是他广采西书加以翻译,“译有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五则”。并于1862年与王韬合作撰写《火器略说》一卷,主要论述枪炮制造原理。随后王韬又补充《铁甲战舰图说》、《火镜焚敌积聚法》、《电器霹雳车攻城法》、《气球放弹焚毁敌营法》等多篇。1864年该书刊印发行后,“为海内外所称赏”。丁日昌十分推崇此书,写信向李鸿章推荐。还与伍廷芳一起负责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报纸《中外新报》编辑印行工作。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1878年为陈兰彬奏带随员,派充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翻译,后改派为金山总领事馆翻译。

#### 附注三:

1848年秋冬,容闳和黄宽决定读大学,开始准备考大学的课程。例如容闳在1849年4月12日致S·W·威廉先生的信中提到,“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到去年冬天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以求符合读大学的需要”。(转引自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载于《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565页。)

#### 附注四:

黄宽(1828—1878)名杰臣,号绰卿,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1850年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五年本科的学业。接着他继续攻读病理学和解剖学硕士课程,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毕业于英国大学并获硕士学位的首名留学生。1857年作为中国第一位医学硕士回到中国后,先在香港开设诊所,次年迁回广州,以毕生精力,在广州从



事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他在广州开设第一家由中国人主持的西医诊所,因其学识渊博,医术娴熟,医德高尚,远近前来就医的中外人士甚多,因他是中国人,深得当地同胞的信赖,推动了西医在广州的流行,到1859年其诊所已有床位80张。自1859年起,在自己诊所培养4名中国西医学生。1860年后,曾受命担任过李鸿章医疗顾问,仅半年便辞职,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1859年1月,美国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创设博济医院(前身为广州新豆栏医局),这是在华历史最久远、影响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医院以所谓“博爱济众”为宗旨,设有专职牧师和男女传道人,在诊治病人的同时传播基督教。嘉约翰曾长期担任该院院长。黄宽也深为嘉约翰敬仰和器重。博济医院开张后,黄宽则常到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比如疑难病的会诊、大手术的施行等。许多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的医术比许多欧美医生还高明,纷纷找他治病。嘉约翰在做手术时,多由黄宽协助或主刀。1863年起,博济医院开始招收西医学生,黄宽则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1866年,医院正式附设南华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招收男生入学。黄宽和该院院长嘉约翰担任主要教学任务。黄宽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嘉约翰撰写教材和讲义时,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汇问题,总是求助于黄宽,与他精心研究,直到找出最为准确的词汇。1876年,学校扩大实验室设备,建立标本室。1879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学。学校基础理论课学习为三年,然后进行临床实习。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人才。不仅如此,经他们的辛勤努力,西医包括它的医院制度、医术医药、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和医护宣传等一整套全新的医疗体系,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

1878年10月15日,黄宽终因过于操劳,不幸于壮年逝世。除了容闳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赞誉外,嘉约翰对黄宽的评价是:“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典范。”<sup>①</sup>



---

<sup>①</sup> 参见刘圣宜:《容闳及其师友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贡献》,载《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353页。



## 第五章 我的大学生活

我在进耶鲁大学之前,经济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我不知道在没有一个确定的十分有保证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怎样完成大学学业。靠打工挣钱维持教育,说起来容易,并且还富有一种强烈感染人们想像力的浪漫情调,然而一旦它成为具体和现实的事情,那么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我犯了一个难堪的错误,而陷入困境。除了布朗和哈蒙德两位先生能帮助我之外,再没有别人,布朗为把我带到美国已费了很多气力,哈蒙德则从学习上帮我以考取大学。我只有求助于他们两位,从他们那里求得指点和良策。他们告诉我不妨利用提供给贫困学生的应急费用。这笔资金由孟松学校理事会掌管,把关非常严格,规定领受者必须在一份已写好的誓约上签名,为牧师职业而学,学成之后当一名传教士,不然,绝不可以享用这笔资金。事实既然如此,我坚定而明确地表示,我完全不适合申请这笔资金。可是,学校理事会仍然约定一个日期,让我到牧师住所商讨这个问题。他们说,假如我愿意签订誓约,保证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sup>①</sup>那么他们将非常高兴由我来享有这笔资金。我向理事会表明,我之所以

---

① 1851年6月1日耶鲁大学基督教教堂记录“容闳来信承认”(Wing admitted on letter),可为其入耶鲁大学以前曾受洗礼的文证;又据杜吉尔牧师1878年的演说,说容闳在孟松城读书时皈依基督教,这进一步证实容闳在入耶鲁大学之前即已为基督教教徒。



不能签署这样的誓约,是因为下列几个原因:

首先,签订这样的誓约,将会妨碍和限制我的作用。我需要行动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做最大好事。如果必要的话,一旦我发现旧有条件不利于促进实施我为中国谋最高福利的计划,那么我就得竭力创造新的条件。

第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传教士职业都不是一个人一生中能为国家谋最大福利的惟一选择。在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只要一个人具有基督精神,那么,他立志为国家谋福利的抱负就不可能被限制得了。反之,一个人若没有这种精神,那么世上任何誓约都融化不了他那颗冰封般的灵魂。

第三,这样性质的誓约,将会妨碍我利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机会或事件去为之尽自己最伟大的奉献。

“为了上述原因,”我说,“我必须谢绝签署这项誓约,同时也谢绝接受你们为帮助我而提供的善良资助。我感谢你们,在座的各位尊敬的先生,非常感激你们的好意。”

布朗和哈蒙德后来都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见解是正确的,并表示支持我的态度。诚然,我很贫困,但我绝不能屈服于贫困,而迫使自己以心灵深处坚定的信念和责任为代价,去换取暂时的物质享受。

1850年夏天,布朗到南部逗留了一段时间,是去看望他的一个姐妹。他利用这次机会拜访了佐治亚州萨凡纳城(Savannah Ga.)的“妇女协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的一些成员,他向她们说起了我的情况。他返回时,恰恰是关键时刻,因为我和学校理事会的会谈刚刚结束。我把会谈结果告



诉他,如前面所述,当时他称赞我的做法,并告诉我他在萨凡纳为我所做的一切。他说那里的妇女协会成员答应帮助我进大学深造。这使我受到鼓励,我鼓足了勇气,前往纽黑文参加入学考试,并考试合格。我怎么考进大学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学了15个月的拉丁语和12个月的希腊语,以及10个月的数学。我的功课预习曾一度中断过,因孟松学校附近修筑从帕尔默(Palmer)到新伦敦(New London)的铁路,因此学校不得不停课一段时间。全班有十分之九的同学,他们为考大学所作的准备远比我充分得多。但不管怎么说,我入学考试没有不及格的。不过,我相信我的入学准备确实不够充分,这从我的课堂背诵、朗读和口头答问等练习中可清楚地得到证明。当时我在双重困境中挣扎,我既要考虑经济问题以至于计算怎样花最少的钱而生活下去,同时又要保证在学习上使自己跟上班级进度而不落后于人,这是一段最严酷的日子。在大学一年级时,整个学年我每天晚上都要苦学到12点。我很少锻炼身体,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锻炼,我的健康状况和精力开始衰退,后来我不得不请假一个星期,到东温泽去休息一下,回来时精力恢复了好多。<sup>①</sup>

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全然不喜欢数学,特别是对微积分,我憎恶和痛恨它,我感觉它在陶冶心灵方面几乎对我一点益处没有,我在这门功课上是失败的,常常不及格,因此我总以

---

① 容闳入大学后,初曾参加一二年级足球比赛,他老穿旧衣服,头戴一高草帽紧压其盘卷的辫子,在球场上奔跑,竟成为传奇式的足球英雄。因自顾功课繁重,与美国同学比之,自觉相形见绌,惟有以勤补拙,为此身体健康颇受影响,不得不稍作休息。

耶鲁大学计分标准,以总平均(2)为及格,(3)为荣誉奖。容闳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总成绩平均得(2.12),第二学期平均分数为(2.45),均超过及格标准,特为难能(见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

缺页



加在一起,已足够应付所有开销了。设想当时大多数乡村牧师的年薪大约两三百元(当然,捐赠会每年还将发给他们一些补贴金,不过,有时捐赠会所拿走的捐款甚至超过实际捐赠的数额<sup>①</sup>),按照惯例,他们就能够担负起照料一大群子女的责任,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相比之下,我收到的捐款数额,折合起来,几乎与那些牧师家庭生活水平相当,因而我当然应该能度过大学阶段,况且还有些热心的女士,她们对我的教育很感兴趣,捐赠给我衬衫和袜子。

关于 1854 届,到毕业时,我们得知共有 98 名学生获得毕业。作为 1854 届的一名学生,我感到十分光荣,能成为这一届的一名毕业生,我感到非常幸运。作为第一位中国人从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消息一传开,我自然是相当引人注意的;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担任过学校两个辩论社团之一[另一个社团名称为“利诺尼亚”(Linonia)]的图书管理员两年,比我高三届和比我低三届的社团成员都认识我。这一原因,大大地帮助全校同学普遍熟知我,而我的国籍,理所当然地为我的事迹的流传和普及更增添了诱人的情趣。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在耶鲁大学早已是一个知名人物,享有那么多的赞誉,不过,也都是些过誉之词,实有盛名难副之感。而那也都是过眼云烟,毕业后一切就都很快过去了。

整个大学期间,中国的可悲状况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令人痛惜的一幕幕,使我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年,我的心情则更感压抑。每当我消沉失望时,我就常常希望自己要是从未接受过教育多好,因为教育的的确确已

---

① 言下之意,那些乡村牧师不一定能得到捐赠会所给予的一年一度的补贴金,有时根本得不到,不仅如此,可能还要倒贴一点。



扩展了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进而启示我应负的种种责任,而这些责任决不是那些愚昧无知、闭目塞聪的人能够感受得到的,而人类的苦难和邪恶,也决不是那些没有教养、冷漠无情的人能够敏锐感知的。一个人懂得的知识愈多,他的痛苦就愈多,必然地,他的快乐也就愈少;反之,一个人懂得的知识愈少,他的痛苦就愈少,因而他的快乐也就愈多。可是,这种人的的人生观是卑下的,其感情是怯懦的,决不属于品德高尚的人,实不足以称道。为了获得教育,我远涉重洋,凭借勤奋刻苦和自我克制,我终于在竞争中达到了渴望已久的最值得追求的目标。虽然我所学到的知识没有理想的那么完满均衡,还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我完全合乎大学普通教育的标准,完成了大学文科教育的计划。因此,我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已受教育的人,而且就以此种身份,我应该问自己:‘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于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我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1854年到1872年这长长的岁月里,<sup>①</sup>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为圆满完成这一目标,我一直在苦苦地努力着,默默地期待着。

---

<sup>①</sup> 容闳于1854年毕业回国,历经18年,直至1872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



## 第六章 返回中国

为了开始施行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热衷最重要的事业，我第一步就是朝着东方航行，返回我的祖国。我已阔别祖国差不多十年了，但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装着她，我无时无刻不在向往她，祈望她的人民康乐幸福。我非常想在美国多留几年，以便攻读一门自然科学课程。那时，正当由诺顿教授（Professor Norton）负责的雪斐科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刚刚成立之际，<sup>①</sup>我就到该院学习测量学。假如当初我有资力读完一门实用性专业，那么可能会有助于缩短和推进我所期望达到的目标的进程。可惜我很贫穷，没有经济力量再供养自己读书，与此同时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若再呆下去，将会永久留居美国，而中国则将完全失去我这个人。于是我接纳了这么多劝诱我尽早回国的种种理由，只得放弃自然科学课程的学习，就此结束留学生涯，踏上归国之途。最热切希望我回到中国的那些人是，古德赫尤公司（Goodhue & Co.）的皮莱代亚·佩里特等先生（Pelatiah Perit of Messrs.），他们是做中国生意的进出口贸易商人；还有奥立芬兄弟公司的，八年前他们曾极为热心地援助我搭乘他们的“女猎人”号帆船赴美。这些先生们很想要我早点回到中国的动

---

① 即耶鲁大学之理工学院。后来容闳的两个儿子均求学于耶鲁大学，其长子就毕业于该院；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位留美幼童也均于1881年毕业于该院，且欧阳庚之子于1914年毕业于该院，詹天佑之长子文珣亦于1918年毕业于该院。



机,无非是希望看见我在使中国人成为基督教徒方面有所作为罢了。这一点,与他们所具有的那些为人熟知的宽宏大度和仁厚善良的品质是协调一致的。

曾于 1845 年赴香港接替布朗先生工作、担任马礼逊学校教师的威廉·艾伦·麦希牧师,当时作为一名传教士,由美国教会派往中国传教。这样,我和他结伴返回中国。我们乘坐纽约钱伯和海瑟两先生的合股公司(Messrs. Chamber, Heisser & Co.)的“尤里克”号(Eureka)快速帆船,船长是惠普尔(Whipple)先生,于 1854 年 11 月 13 日起航前往中国。

冬季乘帆船经由好望角向东方航行,则是一年中最不利的季节,因为时值东北贸易风盛行之时,所以帆船一路逆风是无疑的。“尤里克”号却正是取此道驶向香港的,而船上的乘客只有我和麦希两人。启程那天,天色昏暗阴沉,寒风刺骨。由于“尤里克”号快速帆船停泊于东河(East River)中流,不能傍岸,因而我们只得让一叶小舟送我们登上帆船。起锚前,寻觅岸上,不见一人挥巾送我们远航;当起锚后,也听不到岸上有使我们快慰振奋的欢呼声。在此心境下,我们的帆船被一艘拖船牵引着送到桑迪胡克(Sandy Hook),到了那儿,我们的船就自行地扬帆前进了。那逆风几乎从正面刮过来,风势强劲猛烈,这样船帆不可扯满,也未被卷紧,而是处于缩帆状态,帆船抢风行驶,曲折以进。<sup>①</sup>我们发现船中竟没有载运货物,甚至连压舱货也没有,因此船就如同一个在出海前刚喝了酒的水手,头重脚轻,难以自制。在狂风恶浪中,船被上下抛

---

① 帆船诞生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中国在商朝就有了帆船的记载。相传“殷人东渡”就是一部分商朝人乘帆船渡过太平洋移居到美洲去的。帆船是依靠风力航行的。顺风行驶,自然“一帆风顺”,不过碰到逆风也能扬帆前进,关键是及时把握好风向,保持船头的方向与风的方向成一个正确的角度,即逆风换抢。



掷,左右旋转,好像已无法保持自己的平衡。就这样,好不容易从桑迪胡克颠簸到香港。航程约一万三千海里,历时154天。肯定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为乏味和最令人厌烦的一次航行。

船长是美国费城人(Philadelphian)。他不幸患有严重口吃,这自然使他脾气急躁且易于发怒。他看上去确实是个荒谬可笑的人物。特别是每天清晨,可以看到他在甲板上来回走动,或走或停,或仰望天空,细细观察起来。旁观者见状,便明白他的目的,因为作为一船之长,必须准确把握气象情况,以作好与逆风搏斗的各种无声行动的预备工作。他会骤然止步,朝着凶恶的逆风刮来的方向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因过分激动,满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几乎要夺眶而出,显示出一副不可遏制的怒容;举起双臂,咬牙切齿地紧拽自己的头发,似乎要连根拔掉,同时双脚蹶跳,死劲踩着甲板,狂吼乱叫地诅咒上帝给他送来了逆风。他的面部愤怒得几乎要爆裂,加上他那令人厌恶的诅咒和渎神的言语是极为费力地结结巴巴地喊出来的,这副怪异神态让人看了不免认为他是个可怜又可鄙的人。在航行之初,看见他突然发怒并把自己扭曲成那副怪样子,根本就不像个健全人,更像个精神病患者,着实让人为之心痛。可是在后来的大部分航行中,他的这些表演天天发生,于是我们不再认为他值得同情和怜悯,而是加以轻蔑了。当暴躁狂怒耗尽他的精力之后,他就会慢慢平静下来而恢复正常情绪,于是便无精打采地跌入一张藤椅里,独自坐上几个小时。为了自我消遣,他双手不停地搓着,轻声地自言自语着,偶然脸上会浮出一丝微笑。他的这种模样使他看起来真如同一个无知的白痴。航程尚不到一半,这位船长如此的一个傻人,他对逆风所表现出来的愚蠢疯癫的行为,已成为全



体船员的笑料。当然,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船员们还不敢有不顺从的表现。帆船航行则完全由大副操纵,这人简直就是一个海上恶霸。船员都是瑞典人和挪威人。如果换成美国人的话,当他们遭到船上这些当官的野蛮无人性的待遇时,那么他们早就不堪忍受而采取铤而走险的非常手段了。因为这些船员日夜不停地逆风换抢,根本没有休息时间,遭受过度劳累的折磨。整个航程中仅有的一次休息,就是航行到热带时,曾一度无风的缘故,帆船无法航行,这才停下得以休息几天。有关这次难忘的航行,我在日记中作了记载。我们花了近两周的时间才通过望加锡海峡(Macassar straits)。<sup>①</sup>这对我们的耐心是一次痛苦的考验。

帆船逆风换抢艰难地穿过海峡后,船长故意让麦希牧师听到他说的话,其意思就是,他之所以运气这么坏,是因为他的船上有个约拿(Jonah)<sup>②</sup>。我的朋友麦希听了这话,泰然置之,心平气和地给了我一个很有意义的微笑。接着,我俩开始讨论穿过海峡的技术问题。然后,我提高嗓门用足以使那个过时的船长能听见的声音说,假如由我来掌握航行的话,那么十天都用不了就穿过了海峡。我的用意,即是直截了当地指责那个落后于时代的家伙的糟糕的航海技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蹩脚的海员),又是对他几分钟以前说船上有约拿的荒唐之言的反击。

隆冬严寒之际,要航行去东方的话,就该选择绕合恩角

---

① 一译孟加锡,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中段,在加里曼丹与苏拉威西两岛之间,是东南亚区际间近海航线的捷径,是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东北部之间的重要通道。

② 约拿(Jonah)是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先知,一日,他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躲进一条船上。当船行到中途,海上突然狂风大作,船差一点被击沉。海浪越发翻腾,船就要被打翻。约拿告诉众人,这场风暴全由他引起的,只要将他抬起,抛进海中,海就平静了。众人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海浪果然平息下来。这里比喻会带来不幸的人。



(Cape Horn)<sup>①</sup>的路线,而不是取道过好望角,如若是那样,从纽约到香港必定是一路顺风,这不但缩短了航行时间,而且也省去了船长因一路咒骂而在精神系统上所造成的巨大损耗。可是我只不过是个乘客而已,我不知道这艘船为何空空荡荡未装载点滴货物而又必须逆着东北季风航行,难道其航行背后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动机不成。若是绕合恩角而行,那么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环绕地球的旅行将增添一条新航线,并且我将见到许多新事物,学到许多新知识。

当我们航行接近香港时,有一位领航员到我们船上来。船长见他是位中国人,就想让我问他在附近是否有危险的暗礁及浅滩。我一时竟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这两个名词的中文说法,真不知该怎样对他翻译才是。幸好这位领航员懂英语,他是告诉我暗礁和浅滩这两个名词的中文说法的第一位中文老师。于是船长和麦希以及当时在场的一些人都笑话我这个中国人竟不会说中国话。

在香港登陆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我的朋友,即香港《中国邮报》(China Mail)的业主兼主笔安德鲁·肖特里德先生。当我在孟松学校读书时,他曾资助我一年多。我在他办公室与他会面后,他殷切再三地邀请我到他家住下,我接受了他的挽留。随后,我便立即奔赴澳门去见我亲爱的老母亲,<sup>②</sup>我知道母亲此时正望眼欲穿地渴盼见到她久离家门的儿子。我和母亲相见的事,已预先在头一天就安排好了。我穿着西装,因一时不便,无从改换中国服饰。我还蓄着一对八字形胡须,按照中国风俗习惯,这对于未婚青年来说,是不

---

① 南美洲最南端合恩岛上陡峭的南角,属智利。

② 这里指澳门对岸的南屏村。